政治科學論叢／第 100 期／民國 113 年 6 月／頁 37-88

理念變因的分析層次、因果機制與推論驗證*

陳嫈郁**

摘　要

政治科學界在 2000 年後興起一股將行爲者「理念變因」或「能動性」重新帶回研究焦點的趨勢，在這個趨勢下西方知識界展開了各種名目的轉向。這些轉向多藉由借用心理學或認知科學中「認知」或「認知的」概念來解釋微觀個體層次的認知訊息處理所引發的各種決策行爲的改變，進而影響決策內涵與制度變遷或政策結果。此一趨勢主要強調不應僅以「詮釋」方式論述行爲者「理念變因」將其作爲政策分析或制度建構過程的補充變項，而應是將「理念變因」視爲一個具有顯著影響力並且可以進行因果操作與考驗的自變項。整個「理念變因」趨勢的焦點即落在「理念變因」的實證操作化的具體表現，而操作的方式即必須依靠釐清分析層次、確認因果機制與進行推論驗證三個方向進行。

本文首先先就「理念變因」主要的學派理論光譜與各個轉向對「理念變因」的定義、指涉主體進行分析。繼而對政治科學中「理念變因」最常引用的三個主要理論原型與其延展模型的分析層次、因果機制、參照推論與實證應用進行檢視；其分別爲：Anthony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Hedström & Ylikoski 的分析社會學修正 Coleman's boat 模型以及 Bob Jessop 的策略關係途徑。最後，本文將綜合整個「理念變因」趨勢的實證應用與限制，討論對其目前的政治科學的影響。本文認爲

* DOI:10.6166/TJPS.202406_(100).0002
作者衷心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鉅細靡遺的意見與指正，惟文責作者自負。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E-mail: yychen@ncnu.edu.tw。
收稿日期：112 年 3 月 27 日；通過日期：113 年 5 月 13 日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理念變因」趨勢的更張促使政治學界對於結構－行爲者議題已邁進了重要的一小步，各種中程機制理論的開展、疊加與驗證應能爲人類政治行爲研究有更深化理解的正向助益。

關鍵詞：方法論、理念變因、認知科學、分析層次、因果機制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社會科學界與政治科學界在 2000 年後興起一股將行爲者「理念變因」（ideational forces）或「能動性」（agency）重新帶回研究焦點的趨勢。在這個趨勢下西方知識界展開了各種名目的轉向（徐振國，2013 : 35）。包括「理念轉向」、「建構轉向」、「歷史轉向」、「詮釋轉向」、「敘事轉向」、「論述轉向」、「修辭轉向」、「語言轉向」、「文化轉向」、「隱喻轉向」、「論證轉向」、「認知轉向」與「實踐轉向」等等（徐斯勤，2001；徐振國，2013；陳婺郁，2014a ; Abell, 2004 ; Adler & Pouliot, 2011 ; Adler-Nissen, 2016 ; Banta, 2013 ; Béland & Cox, 2011 ; Bennett & Checkel, 2015 ; Bevir & Rhodes, 2010 ; Blyth, 1997；2003；2011；Checkel, 1998；Checkel et al., 2016；Finlayson, 2014；Gofas & Hay, 2011 ; Neumann, 2002 ; Sum & Jessop, 2013 ; Saurugger, 2010；Schmidt, 2008 ; 2010）。上述的趨勢，主要來自於對行爲主義、實證主義與結構主義（特別是新馬克斯主義）等物質主義理論，僅以物質、稟賦與權力等可觀察變項爲推論基礎的經濟理性或「線性通則」（linearity & normality），或以類似物理性質之客觀法則及「普涵律則」（covering law）等，對人類行爲以量化建模方式進行解釋等等所產生的限制與缺陷進行批判與檢討。[1]

探究各學派理論強調「理念變因」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是想藉由「理念變因」將行爲者（個人或集體）的理念或意識等相關變項含納進或合理化在其建構的模式或機制中，期望未來的理論建構不僅能具有結構、物質面向的考量，同時也具有來自行爲者面向變因的論述基礎。簡而言之，各新興理論除了寄望透過對「理念變因」的重新審視，解決結構－行爲者兩難以及物質－理念兩難的困境外，更希望能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透過「理念變因」驗證人類的自主性與策略選擇，以及其對於決策行爲的影響。也就是，將「行爲者」帶回政治科學（Bennett & Checkel, 2015；Hay, 2002；Marsh, 2009；2018）。[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 本文主要以批判實在主義的「理念變因」論述爲基礎。

2 依據社會心理學者 Bandura (2006) 的觀點，「行爲者」（agency）可以區分爲「個人行爲

因此，重新考慮帶回「理念變因」趨勢（ideational approaches）本身，可謂橫跨了極大的學術光譜。從建構主義、批判實在主義、後實證主義、後行爲主義、後結構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都有許多學者支持這樣的更張與挑戰。而各政治科學界對於「理念變因」趨勢的努力，大部分集中在以批判實在主義或後結構主義理論後設爲出發點，將重點置放於本體論上超越物質 vs. 理念；認識論上超越結構 vs. 行爲者；方法論上超越量化 vs. 質性方法。在驗證個案的時間序列取樣上，兼重過程的持續與斷裂；演化上的均衡與偶連開放結局以及路徑上的線性與非線性發展；變遷動力則同時考慮外生性與內生性變因。於是，強調「理念變因」是一種鑲嵌於特定時空背景與條件下（包括物質、結構、資源稟賦）的「社會本體建構」因果信念，成爲這個趨勢大部分學者所共同接受的出發點（Béland & Cox, 2011: 13）。同時，他們也都強調行爲者的「內省」（reflexivity）、「反思」（reflective）、「認知與後設認知」（cognition and meta-cognition）等心智能力會形成微觀層次的「主觀心智模式」，對所處的情境認知理解後進行詮釋；以及強調文化、心理、意識形態、歷史與背景環境等現有機制源自於結構與行爲者之間的互爲主體性的共構關係，藉以凸顯其與過去行爲科學與實證主義的差異（Blyth, 2003: 696；Finlayson & Martin, 2022: 172；Trampusch & Palier, 2016）。二十幾年來，這個趨勢雖然沒有形成一個學術界體系完整的新典範，而是以修正、補充或整合的「中程（middle-range）理論」方式存在各個學術領域。但是它對於整個政治科學界，尤其在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經濟、區域治理、比較政治、文化社會學、公共政策決策過程分析、新制度論與治理理論（包含跨域與網絡）等領域，不論是在其理論更新、方法多元或實踐與場域的界定上，影響都甚爲深遠（Bennett & Checkel, 2015: 3-37；Kamkhaji & Radaelli, 2022）。

二、研究目的

從理論後設觀點觀之，這一波「理念變因」趨勢可以說是針對源自於

者」（personal agency）、「代理行爲者」（proxy agency）（如隨職務而來具有資源稟賦與的行爲者）以及「集體行爲者」（collective agency）三種（Marsh, 2018: 202）。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1970 年代後，行爲主義與實證主義各學派與以自利與經濟理性等微觀基礎，在應用、解釋、推論與預測層面的限制與缺點而來。因此，「理念變因」趨勢最大的共同點在於必須先克服結構 vs. 行爲者兩難困境，確認分析層次與因果途徑，以尋求可驗證性的路徑或模型。因此，整個趨勢的內部雖然橫跨很大的學術光譜且體系龐雜，但仍然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特質：一是「理念變因」趨勢係以科際整合跨領域的方式重新將「理念變因」定義成一個自變項，並試圖驗證它的影響與效果；其次，是對於分析層次的釐清，特別突顯「中觀層次」（meso-level）或中程層次機制的探討，即其如何銜接巨觀集體與微觀個人層次「理念變因」的機制推論；三爲著重對上述銜接各層次間「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之建構、演化與推論加以驗證，並要求嚴謹的「可操作性」（operationalization）與實踐；四爲以「分析折衷」（analytical eclecticism）多元方法超越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的對立困境；五爲重視以「歷時性過程追蹤」（process-tracing）的觀察分析與蒐證，作爲因果推論的依據。六、「理念變因」趨勢對人類決策是特定時空條件下，所建構出「社會本體」行爲者間互動後的策略選擇，具有高度共識。可以說整個「理念變因」趨勢的發展是一個理論與方法論上深化，以及實證操作上的複雜化。因此，釐清「理念變因」的分析層次，並提出不同層次間「理念變因」的轉換機制與驗證是目前整個趨勢發展的主要重點（Beach & Pedersen, 2019；Béland & Cox, 2011: 16-17；Bennett & Checkel, 2015: 90-93, 97；Goertz & Mahoney, 2012；Gofas & Hay, 2011；Mahoney & Snyder, 1999；Schmidt, 2008；Sil & Katzenstein, 2010；Sil, 2020）。

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首先，從理論建構、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爲出發點，試圖對「理念變因」趨勢學派建立一個全景式的圖像，藉以突顯「理念變因」趨勢各學派在定義、主要論證與實證方法上的異同。其次，釐清目前政治科學界「理念變因」趨勢的主要幾個學派途徑、進而比較其在「理念型」因果機制、分析層次及操作推論與途徑以及適合應用領域的差異；最後，探討上述的各「理念型」架構在實證應用時的優缺點與可能達成的操作性驗證程度，並提出初步的批判。基於上述的旨趣，本文第貳節先討論主要的學派理論光譜對「理念變因」的定義與指涉內涵；第參節則依次探究各學派分析層次的界定、因果機制的操作性與推論參照，並討論其在

臺灣期刊資料庫

實證上可能的應用方法；同時討論這樣的作法與傳統的巨型與微觀理論有何差異與優缺點。最後，本文將綜合整個「理念變因」趨勢的理論與應用，對其目前的發展提出初步的批判與建議。[3]

貳、「理念變因」的定義與指涉主體

政治科學領域關於「理念變因」的討論，大致可以區分爲「以結構 vs. 行爲者與心 vs. 物之間辯證關係爲主軸」以及「以決策理念指涉內涵層次爲主軸」兩大類。前者多爲哲學、社會學（尤其是社會建構論、批判實在論與後結構主義）、語言學、社會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甚至是神經科學）、歷史社會學、國際關係學與新制度論等基礎理論領域；後者多以政治學、比較政治、決策過程、政策分析等以政策理念或典範遞移爲核心概念之應用學科領域。然而，可以說「以決策理念指涉內涵層次爲主軸」係建立在「以結構 vs. 行爲者與心 vs. 物之間辯證關係爲主軸」的理論基礎上（Béland & Cox, 2011: 25；Bennett & Checkel, 2015）。[4] 歐美學者有關「理念變因」的著作幾乎是交雜混合的、跳躍的使用上述兩個基本分類與概念。這也使得「理念變因」的學術討論開始就陷入架構龐雜、定義混淆模糊與實證操作高度難度等困境（Sum & Jessop, 2013）。

以結構－行爲者之辯證關係出發的論述，將「理念變因」大致區分爲巨觀、中觀與微觀三個層次。從微觀層次而言，「理念變因」係指行爲者受「個

3　從 2000 年到 2013 年階段，「理念變因」趨勢的著作多以批判行爲主義與結構主義、進行對話、建構理論與概念化提出「理念型」模型爲重點。2013 年後，分析社會學脈絡的 Bennett (2013)、Bennett & Checkel (2015)、Beach (2016) 與 Beach & Pedersen (2019) 始開始探討如何操作模型的議題。而 Giddens 與 Jessop 脈絡，則繼續理論概念化討論，主要仍以詮釋作爲主要操作方法。

4　例如 Metha (2011)將決策理念變因區分爲政策決方案、問題定義與公共哲學／時代精神；Schmidt (2022: 122) 將制度中的「理念變因」分爲「及時應景層次理念」（the immediate level of policy ideas）、「中介層次計畫或典範理念」（the intermediate level of programmatic ideas of paradigms）以及「深層哲學理念」（the deeper level of philosophical ideas）如意識形態、霸權論述與公共哲學等區分，本質上都是呼應「結構-行爲者」間微觀、中觀與巨觀不同分析層次間機制的辯證關係而區分。

臺灣國家圖書館

人內部」（intra-personal）的認知、情感與情緒等因素透過人腦訊息處理機制的運作機制與過程。其所表現出來的政策策略計算、決策行爲與態度等行爲表徵；或指個人（尤其是代表性菁英或政策企業家）對於事件的主觀性詮釋與計算。如理性選擇理論、認知心理學與決策過程分析理論所指涉的「理念變因」多屬於此一類別（Bennett & Checkel, 2015: 473）。在政治科學中，最頻繁被使用的即是「經濟理性」概念（Levi, 2009；Ostrom, 2005）。除了「經濟理性」，其他微觀層次的「理念變因」如偏好、態度與信念等多屬於心理學等相關領域的範疇與應用。也就是說，個人或集體行爲者的態度與行動，本質上係受到個體或制度原本所具有的因果信念影響（Emmerij et al., 2005）。

而中觀層次的「理念變因」則是將焦點集中在與「人際之間」（intra-personal）或「制度之間」（inter-institutions）經由溝通、學習、互動、論述、辯證、實踐、框架意義建構與行動等過程，主客體互動後的政策或結構的改變；或是強調行爲者具備對所處環境的內省、反思、後設或連結等訊息處理因果機制，個人思維基模的同化或調適或策略選擇的更張過程。中觀層次理論通常希望能提出比巨觀理論更明確、簡約與聚焦的變項來解釋某個特定的政治現象或演變，尋求「某種程度上的通則性」（some degree of generalizability），同時也探究微觀與巨觀理念變因間，是透過何種機制進行相互轉換、影響與運作。也就是，中觀層次「理念變因」將焦點置放在探討行爲者間如何相互影響，行爲者如何影響結構，以及結構如何影響行爲者的復歸式機制過程（Bennett, 2013；Bennett & Checkel, 2015: 92）。除了試圖克服微觀理論的個人主義缺陷，避免見樹不見林的缺失，也希望能免去巨觀理念變因過度結構化、見林不見樹的決定主義困境。可以說，這是一種試圖融合巨觀與微觀兩種型態理念間的建橋工程（Bennett & Checkel, 2015: 90-93）。「理念變因」趨勢的探討重點多集中在此一層次的討論。

從巨觀層次而言，「理念變因」指的是集體的、結構性的或工具性的意識型態、主要指信念、文化、認同、規範、價值觀、公共架構意義系統、公共論述與其他具有「路徑依賴」性質的思想體系或「遺載」（legacy）（Béland & Cox, 2011: 6；Berman, 2001；Schmidt, 2022）。這些變項即是以往社會建構主義、歷史制度論、社會學制度論、歷史社會學或其他文化結構決定論等相關領域中所指涉的「理念變因」（Berman, 2001；Wendt, 1999）。上述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結構－行爲者之辯證關係爲主軸」的理論發展，大多將重點置放在試圖建立從微觀－中觀－巨觀再到微觀的複歸關係模型，試圖對「理念變因」建立一個理念型的全景式解釋架構（Bennett, 2013）。[5]

歐洲與美、加學者在進行「理念變因」分析的層次、結構 vs. 行爲者關係與因果機制實證或討論不同分析層次間「政策理念」的機制時，所引用的理論原型不外乎社會學中Anthony Giddens (1984) 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Hedström & Ylikoski (2010) 的分析社會學修正Coleman's boat 模型以及Bob Jessop (2001) 與Colin Hay (2002) 的「策略關係取向」（strategic- relational approach）等三個理論。[6] 也就是說，社會與政治科學對於「理念變因」相關理論的討論與實證研究，基本上大都是延展、應用自上述三個結構－行爲者原型之一。

表 1「理念變因」趨勢三大理論原型與主要延展理論基本論述摘要表[7]

理論原型 / 主要延展理論		主要應用領域	理論假設	理念變因定義與性質	主要觀察機制與層次
Giddens 結構化理論	Giddens 理論原型	・文化社會學 ・歷史制度論 ・社會學制度論	社會為從結構、資源等權力結構與尋求意義詮釋行為者間的溝通與論述表徵。	文化傳統、規範、合法性價值、懲罰與規訓。（軟性認知）	・結構宰制、權力懲處、意義創造 ・論述溝通過程
	Wendt 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	・國際關係 ・國際政治經濟 ・國際建制	國際體系之性質與規範擴散係透過國家間認同、共享知識與互動實踐而造成。	文化、規範、信念、意識形態、原則、態度與認同。（軟性認知）	結構－行為者間互為主體的理解、制約、學習、溝通即建構與社會化過程。

5　依據 Sperber & Hirshfeld (1999) 與 Gouin & Harguindéguy (2012) 的觀點，政策分析中的理念變因分析通常以「認知」的詞彙出現，依其指涉理念性質與推論區分爲「軟性認知」與「硬性認知」兩種。「軟性認知」指的是以隱喻性術語、修辭的概念化方式將個體透過社會化學習的理念建構過程，用「類比」或「擬態」（mimic）的方式推論社會集體的認同、文化、規範、傳統與價值等社會性理念變因之建構。「硬性認知」指的是以實驗調查與精確方法檢證與操作方式，將認知科學的相關概念如理性選擇制度論以行爲者的經濟理性、資訊過濾與認知選擇行爲進行操作化，應用在解釋社會現象相關研究。

6　Jessop 原型理論係源自 Archer 的「結構生成取」向（morphogenetic approach）（Jessop, 2001）。

7　本文限於篇幅，三大理念變因原型延展理論僅能選擇一至兩個模型討論。Vivien Schmidt 論述制度論的實證操作國內已有其他學者進行討論，本文不再贅述（陳婺郁，2014b；鄭力軒，202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要延展理論 \ 理論原型		主要應用領域	理論假設	理念變因定義與性質	主要觀察機制與層次
	Thornton et al. 整合巨觀與微觀的跨層次制度邏輯模型	・組織行為 ・量化、微觀取向社會學制度論	巨觀環境與組織制度影響行為者選擇訊息來源;行為者透過激活、社會互動機制回饋組織與環境。	巨觀文化、認同;微觀認同、目標與基模策略選擇。（軟性與硬性認知）	巨觀環境與組織訊息之可利用性、可及性與突顯性;微觀行為者激活、合理化、社會互動、動員與決策過程。
	Vivien Schmidt 論述制度論	・歐盟區域研究 ・政策分析 ・比較政治 ・比較制度	政策分析必須進行政策理念的溝通途徑與論述內涵之分析。	政策架構、框架腳本、集體記憶、論述辯證等。（軟性認知）	政治菁英間溝通與對市民社會之對話、論述與溝通。
Hedström & Swedberg 的分析社會學修正 Coleman's boat 模型	Hedström & Swedberg 理論原型	・分析社會學 ・理性選擇制度論	巨觀社會文化影響微觀行為者;特定時空情境下行為者進行決策選擇與改變、繼而影響制度轉型,並反饋至改變巨觀環境。	巨觀社會文化、行為者（成員）間行動網絡與屬性、行為者之信念、動機、慾望與決策選擇。（軟性與硬性認知）	情境機制、行動形塑機制、轉型機制、條件機率下形成之多重網絡。
	Bennett & Checkel 因果機制與過程追蹤分析	・國際政治 ・區域政治 ・比較政治與制度 ・歷史制度論 ・詮釋社會建構主義	傾向軟性認知、從寬理性之微觀行為者的真實偏好與意圖必須以長期蒐集行為者的公開陳述、算計、策略學習與行動證據推論。	巨觀社會文化、行為者（成員）間行動網絡與屬性、行為者之信念、動機、慾望與決策選擇變遷過程。（軟性認知）	最小理解機制: ・個案內研究－在特定時空權力結構下,行為者理念與策略選擇對於制度的影響。 ・特定理念、共享知識、語言、論述的建構事實與互動過程。 ・特定政策理念建立政治或政策機制的條件機率。
	Beach & Pedersen 因果機制與過程追蹤分析	・比較政治與制度 ・政治制度變遷 ・政治運動 ・選舉制度研究 ・理性選擇制度論 ・政治文化變遷	傾向硬性認知之結構與行為者實體、活動間之決策分析、訊息選擇作為因果推論的依據;但亦不排斥使用軟性認知變項與方法。	巨觀社會文化、行為者（成員）間行動網絡與屬性、行為者之信念、動機、慾望與決策選擇過程。（軟性與硬性認知）	系統性理解機制: ・單一個案內不同層次結構與行為者時土、活動、機制運作、影響細節、資源權力型態之移轉變遷過程。 ・特定理念、共享知識、語言、論述的建構事實與互動過程。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要延展理論 ＼ 理論原型		主要應用領域	理論假設	理念變因定義與性質	主要觀察機制與層次
Jessop 策略關係取向	Jessop 策略關係取向原型	・文化經濟學 ・地理經濟學 ・歷史制度論 ・社會學制度論 ・國家研究 ・政策分析 ・新馬克斯資本主義	結構本身在特殊重要關頭會自動選擇與強化下一個層次的策略選擇條件，如規則、程序、誘因。而特定結構下的行為者則會因為策略選擇訊息上的差異發展初步不同的利益、戰術與互動選擇。	結構與行為者二分在個層次均具有自主性與策略選擇性，並形成復歸性系統。(軟性認知)	・不同層次間結構－行為者的策略選擇機制與調整。 ・行為者間的語辭、論述、互動決策行動。
	Hay 論述與策略選擇選擇性模型	・國家研究 ・政策分析 ・歷史制度論 ・社會學制度論	・任何一個結構對於結構內任何行為者具有不同的選擇性。 ・行為者因己身條件與訊息認知亦均具有不同的策略選擇。	・結構與行為者二分均具有自主性與策略選擇性。 ・行為者與結構間論述為主體建構（軟性認知）	・不同層次間結構－行為者的策略選擇機制與調整。 ・行為者間的語辭、論述、互動決策行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上述三個理論原型提供主要的與概念化理論基礎，延展理論則進行理論更新，並提供更多的實證驗證。[8] 美國、加拿大、歐盟與大部分英國學者較常以前兩個模型爲基礎，而英國新馬克斯主義者或部分批判派實在主義則以 Jessop 的策略關係途徑爲主。表 1 爲「理念變因」趨勢三大理論原型與主要延展理論基本論述摘要表。

參、分析層次與因果機制操作

一、Giddens 結構化理論取向

(一) 理論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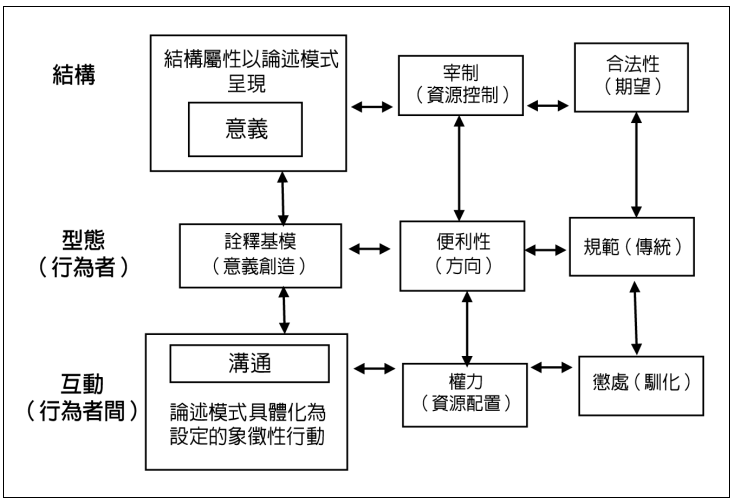
Giddens (1984) 提出的結構化理論是早期歐美學者在處理或理解結構－行爲者與層次分析議題時最常援用的理論原型，他的觀點同時也影響許多同期的社會學與歷史社會學的學者。比較著名的如美國歷史制度論學者 James

[8] 本文之延展理論以對「理念變因」曾提出較明確定義、分析層次、因果機制與具體操作之著作爲主。然而，本文並無法涵蓋所有延展理論。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Mahoney (Mahoney & Snyder, 1999)、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學者 Alexander Wendt (1987, 1999)、論述制度論 Vivien Schmidt (2008；2010；2012) 以及大部分的社會學制度論學者（Powell & Dimaggio, 1991；Scott & Meyer, 1994；Scott, 2008；Thornton et al., 2012）。圖 1 爲 Giddens 論述與結構化理論模型。

圖 1　論述與結構化理論模型



資料來源：修正自 Giddens (1984)

由於 Giddens 主張結構－行爲者「二元性」的觀點，主張結構－行爲者並非兩個各自分立實體，他們就像錢幣的兩面，雖可分別進行兩面觀察，但兩者的關係是彼此融合、互相依賴、交互影響與共變的一體兩面。Giddens 認爲結構唯有透過其行爲者才得以存在，而各個行爲者握有的規範與資源是介於結構與行爲者間的變異來源，而這些規範與資源將能協助或限制行爲者的行動。Giddens 所謂的「理念變因」包括了規範、文化、認同等特定社會「遺緒」（legacy），而一個特定社會中的行爲者係透過學習、同化、模仿（擬態）社會化機制與個體內在的「內省」（reflection）與「反思」（reflexivity）等微觀心理後設機制與外在環境互動（Marsh, 2018；McAnulla, 2006: 284）。[9]

[9] 在政治科學中，個體（行爲者）的內省、反思、同化、模擬、學習等機制與過程常被簡化稱爲「認知」（cognition）或「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許多「理念變因」著作中借用「認知」一詞在定義與操作上都只是「概念性」的借用，如註解 4。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強調行爲者間的「互爲主體」的學習與「交互辯證」的論述與對話，此即系統、制度或組織的建構過程與變遷動力來源。

Giddens在他自己的研究中，大都採取「行爲者中心」（agency-centered）的方式，對於結構的影響比較輕忽，對於結構與行爲者在定義或實證操作上也都不夠明確（McAnulla, 2006: 280）。同時，Giddens 對於到底「理念變因」如文化、規範、價值、意識形態等是不是應該等同於另外一種軟性無形的社會結構或機制，或者行爲者（不管是個體或集體）所表達的意志或詮釋基模就是「理念變因」，其立場顯得相當模糊而界線不明。援用或延伸Giddens理論的著作也多依循這樣的路線，如大部分的社會學制度論著作即是將 Giddens 的結構－行爲者「二元性」概念極致的表徵在社會共同文化、規範與價值體系對於行爲者或制度的規訓、箝制或馴化作用。因此 Giddens的理論延展偏重於對行爲者詮釋架構與論述的分析，「軟性認知」與「從寬理性」色彩相當明顯。本文以下即以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 A. Wendt 與社會學制度論學者 Thornton et al. (2012) 援引 Giddens「結構化」概念所建構的模型探討其「理念變因」模型分析層次與因果機制。本文以他們分別代表「理念變因」之「從寬理性、軟性認知」操作以及「從嚴理性、軟性與硬性認知兼用」兩種典型。

(二) 理論延展、實證應用操作與批判

1. Alexander Wendt 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模型

Wendt 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延伸 Giddens 觀點來解釋國際體系性質的形成與由國際建制倡導的價值與規範的擴散與實踐（Wendt, 1999）。在實證上許多價值的認同與政策擴散之論證，如新自由主義、人權標準、民主價值與環保永續等概念的學習、認同、制約、擴散與制度的變遷過程均是援用Wendt 假設論述（盧倩儀，2014；Finnemore & Sikkink, 1998；McNamara, 1998）。其他如國際規範的形成、認同與實踐與利益的變遷（Wight, 2006；Zehfuss, 2002）；理念、規範與文化因素對於政策分析的重要性（Berman, 1998；2001）以及國際建制中互爲主體的信念形成過程中語言、論述與辯論的重要性（Finnemore & Sikkink, 1998；2001）等議題亦都是依循上述「理念變因」結構化的過程得以實踐與驗證。然而，對於在特定國際建制下，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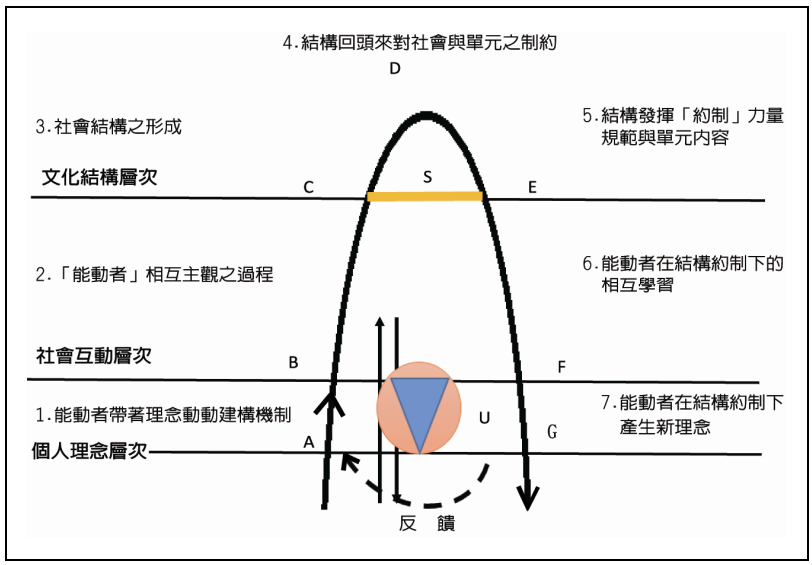
各行爲者（通常是國家）在結構的制約下，內部係如何進行自我（整合）學習？爲何不同行爲者在相互學習與社會化策略上產生差異？不同行爲者間的「互爲主體」理解如何轉換形成上一層次的社會文化結構？此結構形成過程是否涉及其他物質的結構條件？也就是對結構－行爲者的關係以及行爲者間制約、學習、溝通、互動與論述過程以及「理念變因」的條件與傳遞方式，Wendt 則是選擇以存而不論（bracket or as if）的方式模糊帶過。如前述，當對分析層次如何轉換與機制運作的推論與操作以概念化的方式帶過時，對於「理念變因」變項的因果驗證將顯得非常困難。這同時也是許多以社會建構「結構化」理論作爲論證基礎在進行實證時所面臨的共同困境與批判。

國內國際關係學者宋學文曾以建模的方式，對 Wendt 社會建構主義的相關概念具體化爲層次分析架構，即試圖在明確化上述的推論困境（如圖 2）（宋學文，2008：187、189）。宋學文所建構的國際社會區分爲個人理念層次（以擬人化的方式將國家「擬態」爲個體行爲者）、社會互動層次、文化結構層次等三個分析層次。行爲者初始即帶著「理念」與「價值」(1) 與其他行爲者在社會互動層次進行「互爲主體」的互動 (2)，進而形成文化結構層次的社會結構 (3)。而國家（行爲者）最初的「國家認同」與「國家利益」等理念是可以經由社會受與到其他行爲者間「互爲主體」的互動形塑、常模擴散與影響，並經由學習而改變。宋學文指出模型中的 (4) 是結構對於行爲者與行爲者間互動的制約，而 (5)、(6)、(7) 所呈現的所代表的即是不同層次間的「學習機制」（learning mechanism）之模型。宋式的模型運用了層次分析的概念將國際社會規範具體化爲透過制約與學習兩個機制，達到規範從微觀到巨觀的擴散，並不斷反饋到原來的體系（宋學文，2008：188）。然而，上述模型的路徑，僅能呈現單一「理念變因」的制約與學習選擇，無法表現出決策過程中不同「理念變因」間的衝突與選擇。再則，對於結構面的資源、權力與「理念變因」的交互作用過程在上述模型中亦難以呈現。此外，國際關係社會建構「理念變因」的觀察主體通常是巨觀層次變項，如國際建制規範、價值或特定意識形態之擴散過程。因此，在「理念變因」變項的選擇上，通常是以「軟性認知」與「從寬理性」方式進行認定。在推論上，則多以主觀詮釋、論述或邏輯推演方式呈現證據。而這也正是許多理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性選擇與行爲學派對於社會建構理論批評最烈的地方。

圖 2　以層次分析為基礎之建構主義理論模型



資料來源：宋學文（2008：187）

面對上述的批判，建構主義學者 Checkel (2007) 則嘗試將歐盟組織如何讓歐洲國家融入機制的過程區分爲策略計算、角色扮演與規範說服等三個社會化機制，分別追蹤歐盟各國是如何調和國內層次與歐盟區域層次的利益策略計算（經濟理性）、以「扮演角色」獲得話語權（如歐洲金融危機時德國的領導角色）以及以說服促使各國放棄財政權，以支持歐元單一貨幣地位之金融體系等三個次級社會化機制運作與建構過程，解釋歐盟建制化與持續性的成功原因。較之 Wendt 的原型，Checkel 的機制架構不僅可以化解過度依賴「理念變因」的主觀詮釋缺陷，並可較爲全面的檢視歐盟國家在國內層次是如何協調不同「理念變因」路線的衝突，進行策略選擇。在區域層次，歐盟各國又是如何以上述三個機制透過長期論述、溝通、理解與協調達到成立歐洲共同體的目標。同時，也對於未來其他不同的區域建制在不同層次規範或價值的擴散，提供了三個可以操作化的社會化機制可供觀察與使用，甚至進行預測。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2. Thornton 等人整合巨觀與微觀的跨層次制度邏輯模型

(1) 模型建構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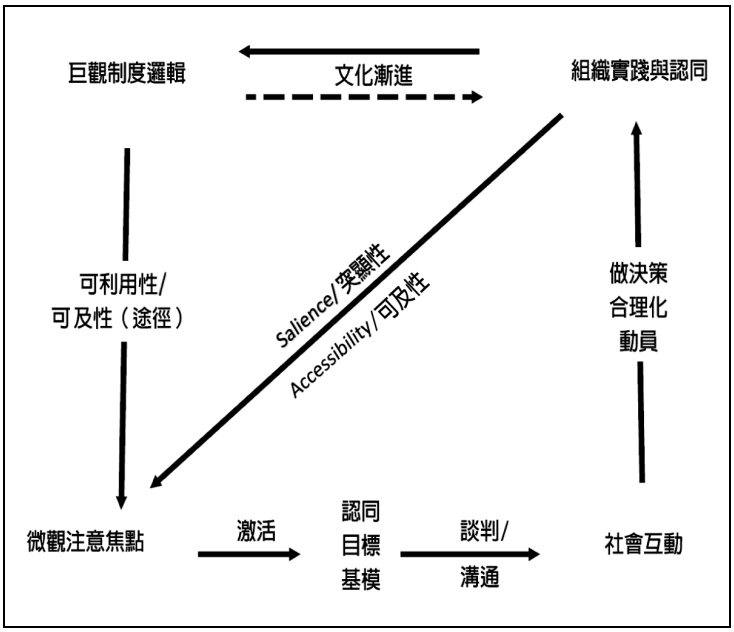
Thornton 等人融合 Giddens 的「結構化」與二元性概念、Coleman (1990) 的 Coleman's boat 模型與社會建構主義相關概念，建立了整合巨觀到微觀的動態跨層次制度邏輯模型，如圖 3（Thornton et al., 2012: 85）。Thornton 等人出發點爲矯正過去社會學制度論與組織社會學因過度強調巨觀「理念變因」如共同文化、規範與價值的規訓作用，而導致解釋觀點過度傾向結構而失去行爲者自主性的缺點。因此，他們轉向應用認知心理學如認知限制、目標導向、基模與制約與社會心理學角色塑模與社會認同等概念，以及人際間衝突、談判與協調等社會互動過程，建立凸顯行爲者的動能性與策略選擇性動態模型。其主要目的在探討組織內部系統包括（家庭、宗教、國家、市場、行會與企業）等組織或制度穩定與變遷因素（Thornton et al., 2012: 50-102）。在他們建構的模型中，在任何制度或組織中的行爲者（微觀個體），初始點都是社會本體的，其認知限制（即訊息注意力）與理性都是「鑲嵌」（embeddedness）、「構築」（nested within）或「被限制」（constrained）在整個巨觀的制度環境中，也就是行爲者的行爲就是「被制約」（situated）、「鑲嵌化的」（embedded）與「限制意圖」（boundedly intentional）。

一開始，巨觀社會環境中認知的、政治的與文化的鑲嵌性與組織場域實踐與認同透過社會互動與社會化將訊息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與「可及性」（管道）（accessibility）傳遞給行爲者。也就是說，行爲者的認知能力有限理性並沒有辦法處理所有的訊息來源，必須透過系統性選擇聚鍊注意力焦點，成爲行爲者的生存的要件（Sternberg & Sternberg 著，李宏鎰譯，2017：137-186；鄭昭明，2006；Thornton et al., 2012: 85）。[10] 而制度的內生性或外生性變因都同時提供了重構與建構的機會所需要的基模、認同與目標。而行爲者系統性選擇的基礎或引導通常是由巨觀結構、組織所提供的。在眾多訊息與邏輯下，每個行爲者原始的資源、稟賦、基模、認同、目標以及與制度的鑲嵌度本來就不同，復以每個行爲者接收的訊息可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0] 此爲認知神經心理學的討論範疇（Sternberg & Sternberg 著，李宏鎰譯，2017）。

圖 3　整合巨觀與微觀的跨層次制度邏輯模型



資料來源：Thornton et al. (2012: 85).

利用性、可及性與「鮮明度」（salience）上的差異，藉以篩選的環境訊息能力與注意力焦點也就會有所差異。這也解釋了爲何在同樣的環境下，行爲者間訊息解讀的差異與注意力焦點的不同。這個出發點讓 Thornton 等人的模型在初始點就調和了結構／行爲者以及「未社會化」（under-socialized）（指經濟計算導向的自利）與「過度社會化」（over-socialized）（指認同等）理性的爭辯，顯示出其厚描從寬理性以及結構－行爲者二元性特質。

繼而，透過激活機制（認同、目標、基模）與社會互動機制（談判、溝通）將會產生人際溝通、資源流動與互賴，影響行爲者的決策、合理化與動員。上述，目標是以結果邏輯爲標準，引導行爲者之認知與利益；認同則涉及社會性價值認知、適切性邏輯與情感承諾；基模則是以過去的學習經驗模式作爲問題解決與推理基礎。以上三者均是微觀個體在進行定義問題、問題解決、推論以及提供心智地圖與腳本等的內部認知機制，引導著認知與社會互動。而透過「物質與象徵」（material and symbolic）等社會接觸的談判、溝通、交換與衝突（包括語言、詞彙、論述、敘事、對話、話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語權與文字等媒介）等權力過程，將達到建構一致性與協調行動的目標。繼而穩固、修正或創新行爲者原有的基模、目標與認同。而語言、詞彙、論述、敘事、對話、話語權與文字等互動，本質上就是行爲者間相互傳遞認知意義與架構的主要媒介與行動主體（Thornton et al., 2012: 101）。這個屬於中觀層次過程所涉及的一切行爲者間互動，也就是「理念變因」趨勢的主要研究變項。因爲，行爲者係藉由上述過程與工具來達到對於組織、制度或環境的重構。而此社會互動機制透過動員、合理化與做決策等三種機制，再度對於組織的實踐與認同產生決定性影響。接著，組織或制度的文化實踐與認同將形成新的場域文化與意義，組織或制度，原有的文化則得以再製、漸進式改變、轉型或變遷等方式，繼而影響整個巨觀的環境邏輯周轉複歸（Thornton et al., 2012: 84-102）。

Thornton 等人的模型是一種建構在認知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微觀行爲者中心之分析層次架構，重點在於以訊息流動與訊息競逐（可利用性、可及性與鮮明性）解釋個體或集體理性的運作機制與組織實踐以及巨觀結構對個體決策行爲的影響。不管是微觀、中觀或巨觀層次的推論，每個階段都是以個體內或集體擬態的認知機制如注意焦點→激活→認同、目標、基模機制或中觀的特定人際社會互動機制如溝通、談判、衝突→做決策、合理化、動員；以至到巨觀層次的組織實踐、如認同→組織文化漸進的穩固、創新或改變→制度邏輯與制度環境的更張。較之上述 Wendt 等人的模式，Thornton 等人的模型賦予被結構化的微觀層次行爲者更多的動力來源與機制的確認。「理念變因」在此模型中更具自主與主動性質，不再只是被動的學習、馴化或制約。其「理念變因」性質兼具「軟性認知」與「硬性認知」性質。每一個機制過程亦都可以在概念化後，予以更明確的操作型定義與進行操作化實證。也就是說，Thornton 等人的動態跨層次制度邏輯模型建構係以社會學制度論與認知心理學爲基礎，綜合了眾多制度邏輯與組織實證研究的實證模型，同時兼具巨觀、中觀與微觀層次的分析與連動。

(2) 實證應用

在實證應用上，以 Hong & Mallorie (2004) 爲例，他們應用上述的動態模組研究跨雙文化下的華裔與純種白人行爲者如何依其訊息的可利用性、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及性與激活狀態學習到各種與組織邏輯對撞的多重對照知識，形成獨特的個人認知、人格特質進而對他們對於個人權益與族群義務行為上產生差異。同時，他們亦驗證文化變項是以一種習得性與變動性的共享知識結構網絡影響個體的認知與行動。因此，各個國家在處理多元文化或新移民問題時，必須同時考慮影響行為者訊息的多元管道以及不同種族之間的認同、基模差異與社會互動習性才有可能推升相關凝聚認同政策之效能。Hong (2009) 指出這樣的動態文化機制模組將較以往社會學制度論僅能以主觀描述與詮釋特定文化現象或特質，將文化作為背景描述變項，進化到可以以訊息途徑分類等操作化、進行微觀激活機制與人際社會互動機制的因果路徑觀察。他們的發現更可為跨國移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或多國籍企業組織的內部治理在人力資源調配與組織任務分工時提供重要的參照。

綜上，動態跨層次制度邏輯模型是一個組織決策與轉型的過程，決策行為就是「理念變因」的形成、實踐與改變。每一個階段都能再分形出不同的細部推論模型，每個階段環境與行為者的訊息處理機制與行為都可以是探討的重點。而驗證的方法，依其跨越之分析層次，可以逐步由「軟性認知」到「硬性認知」（或反之）的方式推論。此一模型因涉及了行為者精確的訊息處理與認知機制推論，以此模型來探討巨觀社會制度層次的議題，就難免會有組織擬態行為者與分析層次間如何推論轉換的問題出現。因此比較適合應用在有限場域的組織或制度內部特定決策行為與「理念變因」如何推動實踐特定規範與組織文化的議題。

整體而言，在理論層次 Wendt 與 Thornton 等人將 Giddens 結構－行為者關係與行為者「理念變因」對其策略選擇與行為的影響建構出更為全景式的分析層次與理論架構。在推論上，Wendt 社會建構主義的「理念變因」最初多以探討特定集體理念如人權維護、環境永續、自由市場機制等如何建構認同、學習與擴散規範與並進入建制化過程為主要議題。因為，所涉及的結構層次比較巨觀，「理念變因」變項通常以「軟性認知」方式呈現，探討著重在行為者的認同、學習等社會化過程。然而，許多巨觀「理念變因」議題如全球暖化下環境與經濟政策衝突，通常涉及許多擁護其他「理念變因」的複雜結構與利益衝突。僅以制約、互為主體、相互學習等機制探究複雜理念間的折衝與利益的糾葛，實難以達到獲得這類「理念變因」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運作的機制與眞實面貌。例如 COP28 氣候環境會議，雖然達成所謂「2050 年終止化石燃料」的共識，促使達到淨零排碳的目標。然而，地緣戰略、各國對於能源政策的國內層面考量、產油國與私人企業間的利益衝突問題，絕對不是會議所宣稱達成的理念共識所能解決。如何建立經濟理性利益與理想性理念間的協調與溝通機制，應該才是比較務實的途徑。

據上，如 Checkel (2007) 將歐盟建立過程再區分爲以不同「理念變因」機制考量作爲分析架構的作法，即是在嘗試將巨觀的「理念變因」再予區分細部化，以達到可以觀測與操作因果推論的目標。而 Thornton 等人的跨層次制度邏輯模型則是從行爲者微觀認知與訊息流作爲出發點。「理念變因」可以同時以「硬性認知」與「軟性認知」方式定義與操作。然而，整個復歸模型要進行一次性的複數變項整體模型操作，難度甚高，甚至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因此，不管是理論建構或理論測試推論都必須依賴許多細部化的操作，建構出「中途」（middle-range）機制，始能拼湊出整政策或制度變遷樣貌。

二、Hedström & Swedberg 的分析社會學修正 Coleman's boat 模型

(一) 理論原型

英國學者 Hedström、瑞典學者、Swedberg 與芬蘭學者 Ylikoski 的分析社會學學派認爲各種社會現象的分析不能過度行爲主義傾向，僅用統計學的分析，將之歸因於原子化個人獨立的行動綜合。也不能過度社會詮釋傾向，單就社會整體現象詮釋，囿於僅以「機制爲基礎的敘說故事」（mechanism-based storytelling）作爲推論與論證的證據，將行爲者「內部黑盒子」以存而不論的方式處理，此將缺乏「理論嚴謹度跟實證的關連性」（theoretical rigor & empirical relevance）。

他們認爲社會科學對社會現象的解釋，必須能同時要能展現出個體特質、個體存在的時空、個體間的關係與個體行動的影響等各種不同的層次的巨觀複合呈現（Hedström & Swedberg, 1998；Hedström, & Bearman, 2009）。也就是分析社會學的本體論是一種「結構個人主義」（structural individualism）的「社會本體論」。他們強調任何社會科學理論的呈現必須具備「精確性與清晰性」（precision & clarity），不同層次的社會現象分析必須準確到以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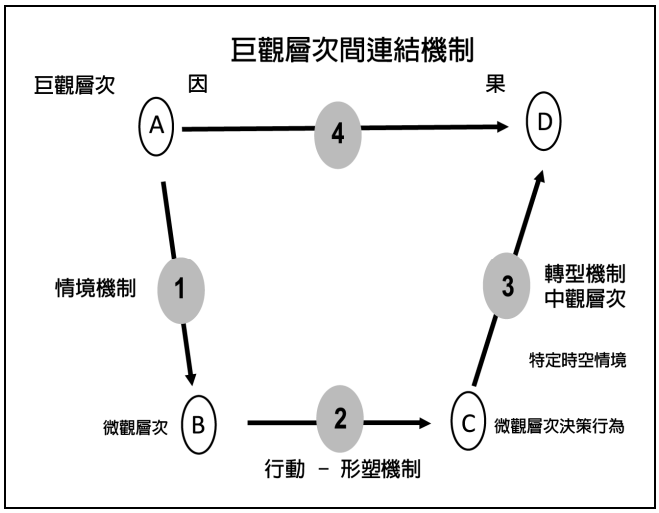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逆溯、一個接一個的因果機制連結之「縱貫」（longitudinal）序列來呈現（Hedström & Ylikoski, 2010: 58；60）。因此，探究機制構成與演變過程成爲分析社會學最重要的任務與特色。

據上，Hedström & Ylikoski 等人認爲社會科學理論與社會現象的分析必須是從微觀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出發，以機制爲基礎，從不同的分析層次探討個體的特質、行爲與社會集體的現象。而層次分析並不是僅單就單一層次的分析，而是以一連串連續的因果機制作爲微觀結構化個人、中觀行動與轉型到巨觀形成新的結構，再對微觀行爲者影響的「全景式」過程與複歸迴圈路徑。因此，社會分析具需具備以下四個「因果機制」的確認與步驟：首先，必須確認「情境機制」（situational mechanisms）（圖 4 ①），即社會結構如何限制行爲者的行動以文化環境如何形塑行爲者的慾望與信仰。上述的動能與限制必須包含以下四個要件：一、個人特質－包含社會或集體中，典型成員行動類型、信念與慾望；二、社會與集體的分配或聚合型態；三、集體成員間關係的網絡類型；四、非正式規則與社會規範對於集體成員行動的限制。此四個要件也就是微觀個體的「理念變因」構成。其次，必須解釋個體的行動－形塑機制（action-formation mechanisms）（圖 4 ②），亦即個人的慾望、信念，甚至是習慣、儀式、動機與各種潛意識認知過程等「理念變因」如何影響他們的行動。這些機制大都屬於社會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的範疇（Hedström & Ylikoski, 2010: 60）。與前述 Thornton 等人雷同，Hedström & Ylikoski 以特定時空建構的「從寬解釋理性」與「厚描理性」來定義理性的來源與內涵，但又冀望能將個人或集體的「理性」建模化。因此，其重點置放在人類從微觀到集體尚未完全理解的「黑盒子」「決策行爲」機制，在推論與驗證操作上難度甚高。第三、釐清「轉型機制」（transformation mechanism）的運作模式（圖 4 ③）。包括個體如何透過行動與彼此間互動，亦即個體間的社會關係如何運作，進而產生各種可欲與不可欲的結果。最後，從「情境機制」、「行動－形成機制」與「轉型機制」間因果鍊的確認，進而推論出巨觀結構間的關係。因此，整個過程包含了個人、個體間的社會關係與集體的行動－也就是社會化與互動過程（Hedström & Ylikoski, 2010: 59）。圖 4 爲 Hedström & Swedberg 的修正 Coleman’s boat 因果機制分析模型。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4　因果機制分析層次



資料來源：修正自 Hedstrom & Swedberg (1998); Beach & Pedersen (2019: 49)

除此之外，Hedström & Ylikoski 雖然期望將各種社會現象建立從微觀到中觀乃至巨觀的以「機制爲基礎」的模型呈現，但是他們卻又認爲建立巨觀普涵的通則理論是不切實際的。因爲每個社會現象的時空條件與背景，是不可能完全重現複製的。因此他們旨在建立各種可以做爲工具箱的「因果機制」可能模型之科學知識。並認爲只要累積由各種學科、可相容的「因果機制」模型就可以整合成層層交疊的「機制網絡」（webs of mechanisms），提供各種較低階的機制如何影響較高階的機制或現象的可能解釋。據上，對於分析社會學者而言，各「以機制爲基礎」的模型勢必是跨科際、跨領域、次層領域與「半通則化」（semi-general）的中程理論（Hedström & Ylikoski, 2010: 61；2014）。而機制的呈現必須是具備簡單、清晰、精準、條件機率式與不可還原等要件的因果關係與建構關係模型。

而在上述的基礎上，所建構出來的機制模型卻往往受限於層層的因果關係、路徑高度複雜性，在實證、推論與應用上通常無法以經驗性方法驗證。於是，爲了克服這樣的障礙，Hedström 與 Ylikoski 等社會分析學者近年來致力於與資訊科學學者合作提倡以代理人基電腦模擬進行各種政治與社會現象的系統性探索與序列模型模擬（Flache & Fernandes, 2021；Hedström,

臺大政治期刊資料庫

2021；Keuschnigg et al., 2018；Jarvis et al., 2022；Yilkoski, 2014）。[11] 同時，Hedström等人亦指出代理人基模擬的理性基礎與理性選擇的自利理性間所存在的差異：理性選擇的出發點是單就以經濟自利爲所有個體篩選資訊的主要參照，並試圖以簡約、律則、共變、相關等作爲一種線性、客觀物理因果推論通則。而以機制爲基礎的模型係以微觀心理學爲出發點，對於人類的動機、價值、情感、偏好與認知過程的訊息篩選等「理念變因」相關變數，都具有相對的時空情境特質，並考量個體的社會結構性關係、環境因素與資源條件。因此，模擬代理人基的決策律則模式呈現必然是網絡化、半結構化與機率形式的「從寬理性」經驗合理性之推估。這樣的律則參數不必然是純經濟理性與原子式個人的，而且可以處理原本數理統計分析做不到的長期、動態、多重代理人的問題。代理人依循的是給定的律則、條件式行爲機制，而這層次的理性概念同時包含了理性選擇中的「從嚴理性」（劉正山，2008：169；Hedström & Ylikoski, 2014）。

近年來以社會與政治現象爲研究主體的社會科學，因電腦科技與程式編寫的普及，逐漸興起鼓勵跨學科領域合作，模擬各類型可能影響研究對象的可能機制變因，進行長期的變遷模式推估。然而，Hedström & Ylikoski也強調代理人基等電腦模擬在社會科學的用途，並非是取代傳統的方法。不論是量化或質性研究，電腦模擬是一種提供更具科學性、有效性的資料與證據蒐整與分析上的補充，目的是在尋求與驗證在不同分析層次影響人類行動與社會現象的可能機制與變因（Ylikoski, 2014: 329-31）。從政治與政策的角度觀之，機制的確認不但可以增進對於事物的瞭解，更可以據以研判預測可能的趨勢與發展，進而祭出各種中介政策，預防問題的發生（Keuschnigg et al., 2018: 14）。

Hedström & Ylikoski的分析社會學相關概念最初係建立在對於傳統質性方法的反思與批判的基礎上。他們認爲傳統敘事詮釋的社會研究對於社會現象的解釋容易流於過度主觀、狹隘或犯了「看似以機制爲基礎，卻是便宜行事的說故事之風險」（the dangers of lazy mechanism-based storytelling）。

[11] 國內學者劉正山（2008）亦曾以專文討論代理人基模擬途徑在政治學相關議題的應用可能性。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他們強調社會現象集體過程或巨觀層次的變遷，不管是理論模型或實證都必須仔細觀察行爲者、行爲者特質與行爲者間的關係所構成的可被觀測機制實體，蒐集機制中行爲者如何行動、行爲者間關係如何、如何互動與如何變遷的資料，才能提供眞正的因果序列推論或預測的參照證據（Bennett & Checkel, 2015: 35 ; Hedström & Ylikoski, 2010: 58, 64）。本文認爲 Hedström & Ylikoski 的分析社會學對於「理念變因」趨勢最重要的影響，在於以機制爲基礎的理論建構，賦予行爲者的「理念變因」與其互動關係更多的解釋權重，著重於條件的分析與過程的動態追蹤，以解開事件的過程爲目標，在因果的推論上更講求實證證據推論，降低了以「存而不論」的主觀詮釋方式在運作上仍不清楚或無法驗證的社會現象之風險。

(二) 理論延展與實證

Hedström 與 Ylikoski 的分析社會學以機制爲基礎、重視動態過程追蹤與條件機率與非結構論的偶連結局等特質同樣適用於質性研究。在理論延展與實證應用上，以國際關係與區域研究學者 George & Bennett (2005)、Bennett & Checkel (2015) 以及比較政治與個案研究學者 Beach & Pedersen (2019) 的過程追蹤方法討論最受到矚目。Bennett & Checkel 與 Beach & Pedersen 均致力於個案內研究與比較制度的過程追蹤方法，其理論基礎與因果機制的推論都是引用分析社會學從微觀行爲者的決策機制爲出發點，解構特定時空條件下，影響行爲者的決策行爲的訊息流、認知模式、偏好建立與策略選擇（如表 1）。本文以下對於理論延展的討論將限縮在前述「理念變因」的範疇。

首先，George & Bennett (2005) 將因果機制定義在特定情境下，具有因果操作能力的行爲者透過「無法觀察」（unobservable）的物理、社會與心理機制傳遞能量、資訊或任何事物至其他實體的過程，而上述機制的影響，卻是必須是可以被測試與推論驗證的。Bennett & Checkel (2015) 進一步將重點置放在影響微觀行爲者「理念變因」的機制與過程分析，但他們也指出最後觀察與分析的目標可以是政治現象中巨觀或中觀的變項。此外，Bennett & Checkel 認爲政治科學中有三個類型的研究適合應用他們所定義「因果機制」與「理念變因」相關概念。一爲試圖歸納建立通則化理論的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史制度論」（Bennett & Checkel, 2015: 13；Mahoney, 2012: 587）。目前在歷史制度論對於藉由探討行爲者策略選擇能力與「理念變因」運作機制的趨勢，已有超越原本僅著重權力結構的傾向（Mahoney, 2016）。二爲社會科學中各種的詮釋建構主義，如科學實在取向國際關係社會建構論中的文化、認同與共享知識（Risse et al., 1999；Wendt, 1999）、社會互構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規範企業家（Finnemore, 1996；Pouliot, 2007）以及基進或後現代國際關係中的「語言」（language）、「論述」（discourse）、「文本」（textual）與「實踐」（practice）分析（Hansen, 2006；Pouliot, 2020）等。據上，可以看出各種詮釋建構主義對於「理念變因」的光譜幾乎可以從實證文化、規範到後現代的語言、論述與實踐都可以涵蓋在 Bennett & Checkel 的「理念變因」概念下進行操作。即使最基進的詮釋建構主義或敘事論述分析，對語言證據與論述分析的標準也逐漸趨於嚴謹（Abell, 2004；Hansen, 2006；Neumann, 2008）。三爲嘗試以「貝式原理」（Bayesianism）條件機率設定來建立或檢視政治或政策機制的可能條件與運作。如什麼樣的條件下，民主政治制度得以較爲鞏固（Bennett & Checkel, 2015: 14-16）。

也就是說，Bennett & Checkel 認爲，理性選擇在推論行爲者眞正的「理念」時，通常是以的「照相式」（snot-shot）的一次性的時間取樣進行推論驗證。這種作法是沒有辦法檢驗行爲者眞正的意圖或理念，也無法交代各行爲者在選擇過程的差異。因此，他們認爲唯有透過對「理念變因」與機制進行歷史性的過程追蹤分析始能建構、釐清整個理念變遷的來龍去脈與各項利益間複雜的運作機制圖像。同時，他們亦不認爲「厚描理性選擇」（thick rational choice）中純粹的經濟利益極大化計算是行爲者眞的原始偏好，因爲行爲者的選擇通常是在特定背景下工具性的策略選擇。他們認爲唯有透過長時間的觀察、蒐集行爲者的公開陳述、算計、策略學習與行動證據才比較能判別其眞正的原始偏好與意圖。此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觀之，政治行爲者公開陳述的理念通常都只是爲了獲取公共形象或矯飾原來可能不被社會大眾接受的眞正信念。任何行爲者眞正信念與理念的釐清，必須透過其前後時間的陳述、公開與私下的表徵紀錄對照，才能進一步驗證其理念的因果影響。況且行爲者在擁有或沒有權力與資源下的決策行爲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從中觀或巨觀層次觀之，規範對於行爲者的影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響程度通常更與規範建制有無物質限制能力，或制度本身的交易成本與效率有關（Bennett & Checkel, 2015: 31-35）。也就是說，Bennett & Checkel 認爲質性研究必須朝向對特定時空的因果機制與結構條件進行觀察與行爲者「理念變因」的進行過程追蹤，始能呈現出更多的事實。

其次，Beach & Pedersen 本質上也是依循 Hedström & Ylikoski 的因果分析層次模型與假定，嘗試對「巨觀－中觀－微觀」的行爲者決策過程進行跨越層次的因果機制與過程追蹤的實證操作（2019：48-49、83-84）。與 Bennett & Checkel 相較，Beach & Pedersen 則是以更嚴謹的方法定義機制與過程追蹤。因此，Beach & Pedersen 將 Bennett & Checkel 的因果機制與過程歸類爲「最小理解的機制」（minimalist understandings of mechanisms）取向。從分析的層次觀之，最小理解的機制比較從巨觀或全觀的角度進行特定歷史事件或政治與制度的單向多重線性分析。這樣的作法，雖然可以建立事件發生的因果時序，但在推論上所提出的機制，也就是結構與行爲者決策間的互動與影響的機制假設，常有過於表面化、不完全與淺層的現象。也就是「最小理解的機制」通常容易有將各機制「混淆」（conflate）、「合併」（bracket）或以存而不論方式處理機制內部的運作問題，至多進行同質變項間共變考驗之缺陷。Beach & Pedersen 認爲這樣的研究僅能呈現時間上的序列上的因果關係，而未能深入到機制內部，呈現機制是以何種方式運行與操作的細節檢視（Beach & Pedersen, 2019: 64-88）。

因此，Beach & Pedersen 提出不同層次的機制必須以巨觀的「系統性理解機制」（systems understands of mechanisms）觀點。較之前面 Bennett & Checkel 的「最小理解機制」，Beach & Pedersen 在分析層次與在結構與行爲者關係的驗證上，更加傾向 Hedström & Ylikoski 的原型。不管是「理論建構」（theory-building）或「理論測試」（theory-testing），在推論與驗證上，Beach & Pedersen 更強調必須對於結構與行爲者「實體」（entities）與「活動」（activities）定義必須更加精確化，從不同的分析層次對於機制的運作、影響細節、資源與權力的型態、移轉與變遷等因果之「生產持續性形式」（some forms of productive continuity），以呈現機制各力量的關係與過程。也就是說，他們認爲機制的驗證必須表現出力量遞移且可供觀察檢驗的證據。對於機制本身並不在於尋求律則通則化，而是尋求「在特定時空環境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下的關連、曇花一現與鑲嵌」（relational, ephemeral and embedded in complex systems）等現象（Beach & Pedersen, 2019: 69-77）。

在實證應用層面上，前述 Bennett & Checkel 的方法比較以「軟性認知」與「從寬解釋理性」的方式進行因果機制中行爲者或集體行爲者「理念變因」的觀察與推論，並且相當重視將建立在數據與統計資料基礎上之因果推論。例如，歐盟原始創始國家在 2004 年允許八個中東歐原共產國家通過加入歐盟之申請，使之正式成爲會員國。這也是歐盟東擴與歐洲一體化理念進入行動話與具體化的里程碑。然而，從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與經濟理性選擇的觀點（如新功能主義與自由政府間主義），並沒有辦法對當時的創始會員國爲何接受中東歐國家進入歐盟的決策提出全面、完整的解釋。此因，中東歐各國經濟發展相對貧窮，與西歐大部分創始國間的經貿往來數量甚低，產業之間相關連帶性亦不高。同時，新增會員國數量將會嚴重釋稀創始會員國的投票權重比值，降低創始國的談判與交易籌碼。更何況，協助中東歐國家民主化與經濟轉型對於原創始國並未具有太多實質的經濟與物質利益，一體化後亦可能引發起西歐各國國內社會政策與移民湧進的壓力。因此，「以利益爲導向」與「以歐洲共同體願景爲導向」兩種「理念變因」在歐盟內部產生很大的爭辯。而對於中東歐國家而言，加入歐盟也並非一本萬利的決策。

爲了更明確的釐清上述兩種「理念變因」在歐盟東擴議題對於政策變遷的影響，Schimmelfennig (2001; 2003; 2005; 2015) 即依循 Hedström & Swedberg 的模型以系列研究，探討歐盟整合與歐盟、北約在東擴議題形成的過程中，不同類型「理念變因」如何影響各原創始國與中東歐各國之政策選擇，並分析歐盟各參與國家選擇東擴決策在各「理念變因」間的「辯證」（argumentative）與協調過程。Schimmelfennig 將影響歐盟國家決策選擇的「理念變因」變項，區分爲「習慣的」（habitual）、「規範的」（normative）、「溝通的」（communicative）、「修辭的」（rhetorical）與「理性的」（rational）五種類型，探討不同類型的「理念變因」對主要行爲者（國家）在認知→目標→行爲→互動結果的序列影響。透過這五種類型「理念變因」的追蹤分析發現：各國在評估是否允許中東歐國家成爲會員國與東歐國家評估申請進入歐盟時，對於創始國而言，「自由民主主義社群」的理念（規範）最終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凌駕了「以利益爲考量」的理念，允許中東歐國家進入歐盟。然而，在歐盟創始國在不同階段的溝通與協調過程中，並非全然沒有來自以國內經濟利益（理性）偏好爲考量的衝突。例如，贊成中東歐成爲會員國中，遠離歐陸、地緣影響較小的英國、丹麥與瑞典同意「全面性擴大」（inclusive enlargement）接納申請入歐盟國家；而受地緣影響較大的德國、奧地利與芬蘭則是希望採取逐步、分階段有限制的東擴政策，除了想增進其出口市場份額，同時亦期待避免重大的經濟、社會安全與移民衝擊。而法國、愛爾蘭與南歐諸國則根本希望延後歐盟東擴進程，避免衝擊其國內農業與傳統產業部門。最終，各原創始國經過四年的國內、區域與國際層面的折衝辯證，雖在「自由民主主義社群」的理念（規範）下確定了歐盟東擴的政策，但也確立了階段式申請審查評估體制與緩進東擴時程兩大原則（Schimmelfennig, 2001: 50）。而對申請入歐的中東歐各國而言，在國際與區域層面，他們利用歐盟創始所宣稱的「自由民主主義社群」的理念（規範）語辭，強調他們申請進入歐盟符合「歐洲認同、一體化、自由民主與多邊主義精神」的適法性，「動員」各國體制認同感，「說服」創始會員國必須在行動上同意中東歐國家申請進入歐盟議案的實際作爲，以符合歐盟創始精神的「信譽」（credibility）、道德感與承諾。而在國內層面，中東歐國家利用歐盟在政治、經濟、貿易與財政上的規範，操作重構其政經建制並重新國內各項資源與權力分配。也就是說，對中東歐國家而言，同樣的「自由民主主義社群」理念，更多意義是著重在工具性語辭的與經濟理性的作用。Schimmelfennig (2015) 對於歐盟東擴進程以上述五種「理念變因」類型進行系列性的過程追蹤，觀察與指認各參與國家的決策模式與決策中不同「理念變因」影響效果，在層次分析與因果推論過程上，都較單以主觀論述爲主體的社會建構主義或經濟理性主義，提供更多具證據力與操作性的機制理解（Beach & Pedersen, 2019: 72-3）。[12]

其他如 Lyall (2015) 則是嘗試以量化統計與「巢套過程追蹤」（nesting process tracing）方法探究二次戰後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內戰因素。他們提

[12] Schimmelfennig 對整個歐盟東擴的政策變遷至少以 15 篇以上的期刊篇幅進行「全景式」模型的驗證與討論。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當國內不同層次的行爲者「理念變因」如被控制的恐懼、復仇的期望與其他機制如後續暴動間具有連動影響，亦提供了對於第三世界國家內戰的發生因素更具證據力的理論解釋與測試模型。最近如美國對於中國外交與經貿政策的改變所牽動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發展現象的「論述」與「語辭」顯著的與以往論述不同，其他如國際間「全球化」與「去全球化」政策辯證或全球暖化議題下的能源與核能使用政策的轉變亦都是相當好的例子。如能將相關行爲者與「理念變因」進行因果分析層次模型討論，相信應可獲得與理性選擇理論或社會建構主義觀點更多不同觀點與不同層面的政策理解。

而同樣應用 Hedström & Swedberg 的模型，Beach & Pedersen (2019) 的「系統性理解」因果機制則是更傾向以機率邏輯與微觀層次「理念變因」策略推論影響國家進行政策選擇與行動的可能機制。例如 O'Mahoney (2017) 即以「語辭綁架」（rhetorical adduction）與「語辭行動化」（rhetorical action）兩個機制建立「辯論框架」（argumentative framework），驗證「理念變因」在微觀行動形塑→中觀轉型→巨觀環境變遷因果機制中的重要性。O'Mahoney 據此提出任何國際規範的實踐其實是具時空動態性、可形塑與可操作的。他以 1971～1972 孟加拉獨立建國爲例，提出在特定的時空與環境條件下，聯合國對於各國分離主義視爲各國內政而不予干涉慣例是可以扭轉與打破的。1971 年東西巴基斯坦進行內戰，印度爲防止東巴基斯坦難民潮湧進因此出兵東巴基斯坦，各國對於印度軍隊駐紮批評聲浪四起，聯合國以 104：11 將印度入侵定調爲違反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的非法行爲。然而，印度與東巴基斯坦在印巴十四天戰爭期間，利用印度係以人道主義名義出兵爲理由→印度出兵係受到東巴基斯坦領導穆吉允許，介入是合法的→如印度同意撤軍，即表示東巴基斯坦反抗軍獲得民眾支持有能有效控制疆土→基於民族自決東巴基斯坦應獨立爲孟加拉共和國等系列「語辭綁架」國際社會「聽眾」（audiences）。不但合理化了印度出兵並不違反國際法的爭議，同時連結了東巴基斯坦獨立的合法存在條件。O'Mahoney 逐一的對國際與區域主要國家在此一事件的政策選擇理解進行分析，檢視印度與東孟加拉如何在當時特殊的國際情勢下，影響其他國家的態度轉向，紛紛同意東巴基斯坦獨立爲孟加拉共和國。並以反證法論證如果當時的英國與印度沒有被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巴基斯坦「說服」，以印度撤兵合理化其對領土疆界是有效控制，兩者都不違反國際法的「語詞」進行連結，孟加拉是不可能在聯合國獲得獨立承認的。近期，以巴戰爭的爭議，以巴雙方的片面論述戰術亦可以看到類似的「語辭綁架」機制的運作。一旦「語辭綁架」與「語辭行動化」的連結建立新的認知框架，即會重新動員與分配權力與物質，形成新的「合法性」結構。

其他如 Kreuzer (2016) 則是以概念化貝式機率過程追蹤質性方法探討採用比例代表選制之國家的左派與右派政黨偏好與經濟政策選擇，也就是選制是否眞的具有經濟的影響效果；亦即左派政黨是否眞的會產出更多的重分配政策，縮減貧富差距。Kreuzer 研究結果顯示：左派政黨與右派政黨在重分配的政策偏好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反而，右派政黨經常爲了極大化（理性選擇理念）政黨席次與圍堵左派，比左派政黨更傾向支持比例代表選制政體與重分配政策。也就是說，政策本身係受到經濟外生性因素的影響，而非源自黨派內生性因素的左右。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出 Beach & Pedersen 的方式可以對影響行爲者策略選擇的「理念變因」進行更精準的分析與驗證。

綜合上面的比較，Bennett & Checkel 與 Beach & Pedersen 雖都致力於從微觀層次的「理念變因」作爲其研究主體的出發點，亦都以提出層次分析、因果機制與過程追蹤作爲理論建構或驗證的方法。然而，仍可區辨出 Bennett & Checkel 的路線比較傾向使用「軟性認知」的定義與概念處理「理念變因」變項，亦即社會心理學或社會學制度論中的文化、認同、意識形態、政策學習與政策變遷等較爲集體性理念的方式進行。嚴格說起來，就是將原來的社會建構主義的論述驗證方法，提升到以更明確的變項細緻分化的個案內比較研究，融入更爲嚴謹的質性「過程追蹤」方法，確立事件因果關連。

因此，Bennett & Checkel 的概念多應用在國際政治與區域政治相關的、較巨觀的國際建制與政策變遷之探討。而 Beach & Pedersen 等人除了上述集體變項的探討，對於行爲者決策分析、訊息選擇在因果機制上的影響，則進行更爲嚴謹的追蹤與考驗。因此，比較傾向「硬性認知」的「理念變因」變項，也就是除了社會心理學的相關概念外，更夠重視運用微觀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認知心理學的資訊流動與決策選擇機制觀點對於行爲者的影響來做爲驗證因果推論的基礎，較常應用在比較政治、政治制度、政治運動與選舉制度等領域。表 2 爲比較 Bennett & Checkel 最小理解機制與 Beach & Pedersen 系統性理解機制在微觀、中觀與巨觀因果機制、觀察指標與驗證上的異同。

表 2　比較 Bennett & Checkel「最小理解機制」與 Beach & Pedersen「系統性理解機制」在微觀、中觀與巨觀分析層次之因果機制與過程追蹤驗證操作表

分析層次與指標 / 機制類別	微觀層次			中觀層次			巨觀層次		
	因果機制	觀察指標	驗證方法	因果機制	觀察指標	驗證方法	因果機制	觀察指標	驗證方法
Bennett & Checkel 最小理解機制過程追蹤（機制可以純推論，無法觀察的存在，不需要以可觀察現象驗證）	基模、偏好、價值、信念、認同（軟性認知）。	行為者在各種不同情境下的論述、策略與溝通是否一致、穩定與共變。	觀察、論述、邏輯推演、歷史事件序列。	理念的遞移路徑與傳遞載體媒介、場域。	檢驗、區辨理念的外生或內生根原。	觀察、論述與邏輯推論。	情境機制如何影響微觀行為者。	因時空差異所形成的組織或制度的規範與物質條件之差異。	觀察、歷史序列、論述、邏輯推演、貝式條件機率推論、代理人基。
Beach & Pedersen 系統性理解機制過程追蹤（機制推論，包含不可觀察機制推論與可觀察事物推論驗證，但機制效果必須是可觀察的）	特定時空條件下行為者的屬性、特質與行動（軟性與硬性認知）。	行為者與環境互動關連、特定時空環境下行動的差異。	觀察、邏輯推演、貝式機率推論。	特定時空條件下，結構條件與行為者間的關連、鑲嵌或湧現。	資源與權力型態、機制關連運作、移轉與變遷之轉型機制。	觀察、論述、邏輯推演、貝式機率推論。	情境機制如何受影響而變遷。再次，形成結構條件影響微觀行為者。行為者之轉變。	因時空差異所形成的組織或制度的規範與物質條件之差異。	觀察、論述、邏輯推演、貝式機率推論、代理人基、電腦模擬。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Bob Jessop 的策略關係取向

(一) 理論原型

英國著名社會學者 Bob Jessop 最先提出策略關係取向係試圖將之作爲一種探討資本主義發展進程與國家治理模式的方法論。他認爲各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積累、生產模式、勞資關係、階級衝突、權力與利益分配、國家治理與全球生產鍊的分工等關係都是一種特定時空下的複雜「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網絡（Jessop, 1990）。因此，任何資本主義與國家治理或管制模式之探討必須能解釋各行爲者如何因應複雜、變動環境，與其他行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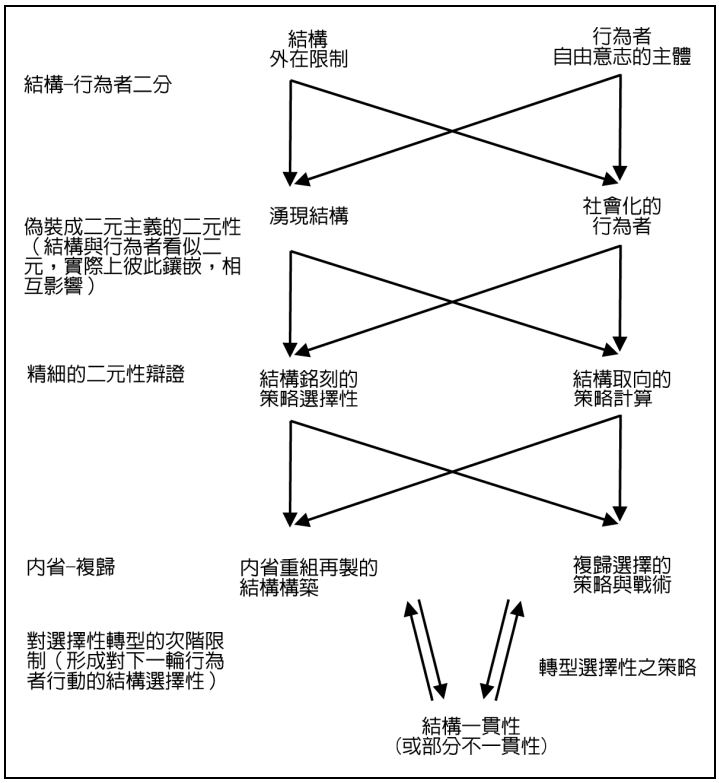
爲者互動，隨時進行策略計算與選擇調整路徑等，始能提供制度演進的眞實全貌（Jessop, 2001；2005；Sum & Jessop, 2013）。Jessop 指出 Giddens 的結構行動理論將結構－行爲者之間的關係以「二元性」的概念，將之「合併化」(bracket)僅能算是一種便宜行事的模糊策略。同時，他也認爲 Giddens 的模型假定同一個結構情境下，所有行爲者行動的資源、能力、規則、認知與學習等都以相同的方式進行更是非常不切實際的觀點，根本沒有辦法提供行爲者從微觀到巨觀是如何轉換的中程觀察。且對於結構－行爲者的關係，僅是以簡約觀察與抽象的名詞概念化，未能表現出結構的時空性與流轉以及行爲者的鑲嵌、策略選擇動態與實踐（Jessop, 2001: 48-59；Sum & Jessop, 2013: 58-59）。

前述 Jessop 不認同 Giddens 將結構－行爲者以「二元性」的方式合併，他認爲結構與行爲者必須清楚分開探討，因爲兩者的屬性並不相同必須予以「二分」（dichotomy），賦予以兩者獨立的自主性與策略選擇性，以探求兩者之間的「關連」（relational）與「辯證」（dialectical）邏輯。同時，事件中整個結構－行爲者的關係與演進過程，如僅以單一層次的描述或一次性的互動觀察（如 Giddens 的結構行動模式）並不足以表現出其動態的互動過程與關係的複雜性。因此，Jessop 將「策略－關係取向」延展成一個具有四個分析層次的模型如圖 5（Jessop, 2001: 1225；Sum & Jessop, 2013）。第一層次，從最原始的結構－行爲者二元爲起始點。結構爲外部限制，行爲者指尚未制約於制度的自由意志，而所謂的自由意志指的卻是特定結構下由各種因素限制下的可能選擇。也就是說，Jessop 的行爲者絕對是「社會本體」的。第二層次，Jessop 指出此一、二層次即是 Giddens 的結構行動模式。結構被視爲在特定時空下，由某些過往的「行動」（action）所建構的「湧現結構與效果」（emergent structure and effect），而行爲者指的是被結構「限制、賦能與社會化」（constrained, enabled and socialized）的行動（Jessop, 2001）。

而從第三跟第四層次開始，才是 Jessop 策略關係取向的重點，他強調必須以方法論「關連主義」（relationalism）的方式呈現。在第三層次，結構指的是在「特殊關鍵時刻」（particular conjunctures）下將會形成另一個層次的策略選擇性。這些關鍵湧現的結構包括法律、規則、結構貫性、規範、組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5　策略關係取向中的結構與行為者



資料來源：修正自 Jessop (2001; 2005; 2013)

織生態動力、路徑依賴、交易成本韌性與懲罰制裁等結構特殊性、競爭性與差異性。亦即 Jessop 認爲任何結構的「構築條件」（structural configurations）會自動選擇、強化特定形式的行動、「戰術」（tactics）與策略，其所衍生的規則、程序、誘因、懲罰都能引導、制約或強化引導各行爲者的動機與行爲，同時也會讓結構設計不偏好的行動受到挫折。亦即，結構會自主性的選擇與偏好特定行爲。因此，結構對各行爲者提供的條件從來都是不均衡、不公平的與差別待遇的。此即爲結構構築本身同時兼具路徑依賴與路徑形塑功能的「結構策略選擇性」（structurally inscribed strategic selectivity）。而結構下的個體或集體行爲者亦並非以「整體合一」（unitary）的方式存在。每個行爲者因其理性有限性無法完全認知到結構的策略選擇訊息，也會面臨與其他持相反理念與利益的對立行爲者衝突。因此，最初的原子化行爲者只能

被導向在結構所提供的選擇性資訊流，或行爲者自己所能認知到可能的機會與行動範圍限制，包括「有限理性、受限於環境的理性形式、個人認知習慣、選擇性注意與邏輯的適切性」（bounded rationality, context-bound forms of rationality, cognitive habits, selective attention , the logics of appropriateness）等因素影響，並以社會化策略與認知學習能力及經驗鑲嵌入所處的環境中，發展出使用不同的行動、策略選擇、議題控制、序列策略互動、結盟、戰術與算計，與「各種企業家形式」（various forms of entrepreneurship）追逐己身定義的利益與目標，克服永不止歇的衝突與兩難困境。對不同的行爲者而言，在個個重要關頭的互動過程中，結構-行爲者都是不斷的以複歸式策略選擇進行內省與重組。也就是說結構與行爲者間是一種共生與共變的辯證關係（Jessop, 2001）。

接著，第四層次展現的是來自於第三層次轉變的後續重要關頭。具有自主性與內省性的結構將重新組合、自我管制與自我再製爲新的結構構築，而行爲者則是不斷的以複歸式的選擇與調整策略與戰術因應結構與環境的變化。也就是說，在複雜多變的情境中，結構本身會進行轉型重新設定選擇條件與新規則；行爲者則是積極運用策略試圖影響結構未來的選擇性條件，讓自身生存更具競爭性。兩者間共變與互動的結果將產生第五層次相對穩定性，兼具某種程度的結構一貫性（structured coherence）或某種型態的不一貫性（patterned incoherence）。亦即，結果將是可欲或不可欲的開放結局（Jessop, 2001；Sum & Jessop, 2013）。

不管就結構或行爲者而言，經由第三層次與第四層次的辯證互動與關連，他們都已經不再是第一或第二層次時的性質。Jessop 策略關係取向最大的特色，除了在第三層次凸顯各行動場域的結構策略選擇性與行爲者的策略計算外，最重要的是在第四層次除了強調結構必須同時聚焦於物質與論述結構與行爲者間的關係，如外來論述、論述結構、結構轉型、自我轉型能力、以及個人與集體行爲者學習過程等。他巧妙的將前述的「語言轉向、修辭轉向與辯論轉向（linguistic, rhetorical, and argumentative turns）等概念融入探討結構與行爲者間關係的架構中。在結構面向，賦予其具備後現代「內省性」（reflexivity）的後設能力，結構將會不斷的進行自主的內省再構、調整與更張策略選擇；同時，在行爲者面向，賦予其「復歸性」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recursivity）與內省概念，促使其在複雜環境下具備進行策略行動的認知改變能力，不斷的修正策略與行動，藉以呈現出結構－行爲者間動態的選擇性與變遷過程。在第四層次的語言、修辭與辯論呈現了比前述各流派論點更精緻化與動態性的操作空間。因此，在 Jessop 的策略關係取向中，「理念變因」既可以被視爲具有結構性質的巨觀存在，但也可以被視爲行爲者策略學習、轉化與策略學習。兩者間的相互辯證都對結構本身、行爲者性質與未來的互動產生影響。

然而，當應用在解構或解釋實際案例「理念變因」的轉向時，Jessop 的策略關係取向在實證操作上卻是相當的困難。除了分析層次與定義上的複雜，策略關係取向本源自於批判實在主義與新馬克斯主義思維，傾向以高層次的文化經濟、地理經濟、「以國家爲中心」治理模式與策略、資本主義模式與制度整體等巨觀架構作爲主要分析對象。雖然從結構－行爲者二元性立場爲出發點，但其所指的行爲者多係以擬態行爲者，如國家、政治經濟菁英或國家官僚菁英等集體行爲者爲對象；且引用其語言、修辭與辯論等語意與論述分析做爲論證結構－行爲者策略選擇與行動的主要方法（Bathelt & Glückler, 2014；Coe & Jordhus-Lier, 2010；Quastel, 2016）。因此，其理論原型的運用通常以「概念化」的方式與詮釋方法進行。整體上，除了分析層次較爲清楚的優點之外，在論證上仍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

(二) 理論延展與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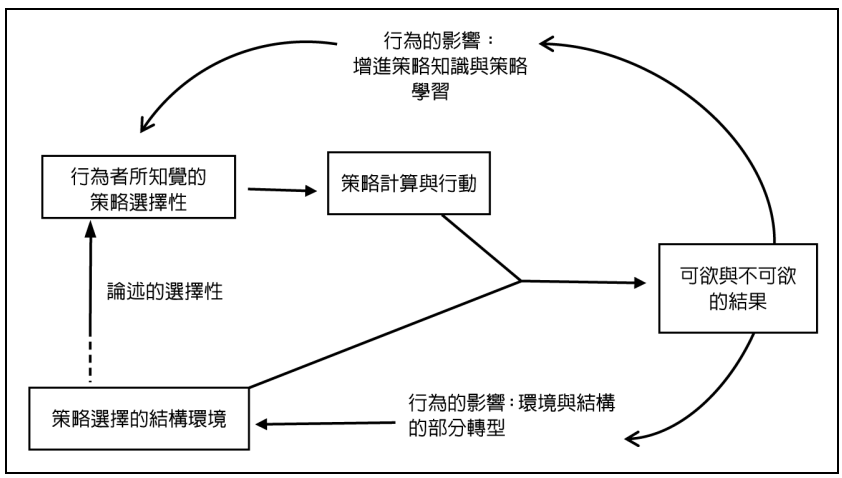
Jessop 策略關係取向四個分析層次模式與前述 Hedström & Swedberg 因果分析層次中的四個因果機制實質上有某種程度的相似，都是試圖想提供結構與行爲者從「全景式」微觀－中觀－巨觀層次間的實證機制與模型，但兩者也都面臨相似的在操作與推論上的困境。依據社會科學的驗證標準，複數分析層次，除了理論假設的複雜度與理論建構較之單一層次有很大的差別外，每一個層次的結構－行爲者之界定與觀察指標也必須至少符合比較研究「組內比較」（within-case study）之考驗規範。不同層次間多個跨層次因果路線流轉，證據展現之釐清、觀察、推論與驗證，甚至研究結果的寫作與論述可謂難度甚高。爲了能增加策略關係取向對於結構－行爲者與其他政策分析議題的應用性，師承 Bob Jessop 的英國學者 Colin Hay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簡化策略關係取向的原型模型爲兩層次論述與策略選擇模型，如圖 6。

在圖 6 中，Hay 的論述策略選擇性模型主要以 Jessop 策略關係取向模型的第三與第四層次作爲主體。首先，不管是社會、經濟與政治的環境都是具有策略選擇性質的結構環境，透過語言論述方式表徵、強化各種爲結構所偏好允許的策略行動範圍。因此，對所有行爲者而言，結構資源、偏好、訊息流、知識、機會與限制的分配從來都不會是公平且一致的。各行爲者對於結構的理解與知覺既已不相同，其所展現出來的策略計算與行動自然也就有所差異。也就是資源、訊息與機會豐沛與否都嚴重的影響了行爲者追逐自利的獲得。因爲，世界上不存在「無所不知」的結構或行爲者，得以完美的計算所有策略選擇演進之可能性，行爲者也常因爲錯誤的解讀訊息而產生錯誤的決策判斷。也就是，結構與行爲者互動辯證的結果通常都是可欲與不可欲，也就是「偶連」（contin-gent）、無法預測與非決定論的（Hay, 2002: 209-11）。

圖 6　論述與策略選擇性模型



資料來源：修改自 Hay (2002: 131, 212)

其二、策略選擇的結構環境透過選擇性的論述方式與行爲者互動，影響行爲者對於因應環境策略選擇性的解讀，互動的結果則會讓各行爲者產生策略知識增進與策略學習的效果，同時也會轉化部分的初始結構，進而調整結構的策略選擇性。「理念變因」同時具有部分的物質效果與相對自主

臺灣期刊資料庫

性，能產生各種形式的權力。而語言論述在此被視爲一種傳達「理念變因」的媒介，中介結構與行爲者之間關連辯證。第三、「理念變因」在此一結構－行爲者辯證關係中具有雙面的特質。行爲者本身本來就有既有的經驗與架構，而特定的理念、敘事與典範提供行爲者對於環境論述選擇性與策略選擇性的理解參照，兩者形成行爲者新的「認知鑄模」（cognitive templates）。從結構面向而言，「理念變因」可以視爲一種具有建構性的「軟性認知」結構；從行動者面向而言，「理念變因」是行爲者「認知鑄模」影響下的策略選擇、意圖、決策行爲與行動，較屬於因果性的「硬性認知」範疇。此即爲結構－行爲者的辯證關係。最後，「理念變因」的探討涉及了主流「理念」與「論述」透過何種機制被制度化與具體化在結構之中，如何透過媒體敘事影響政策與實踐。也就是「理念變因」的效果與觀察必須透過因果機制與過程的追蹤，始得以驗證其影響與效果（Hay, 2002: 211-212；Gofas & Hay, 2011: 13-55）。就實證操作的可行性而言，Hay 的論述與策略選擇性模型更多應用在特定政策的分析（Hay & Richards, 2000；Pastras & Bramwell, 2013）。

例如 Heigl (2011) 以策略關係取向分析在全球自由主義結構調整典範與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架構下，墨西哥最大國有石油公司 *Pemex* 在面對多國籍企業與利益團體的政治遊說壓力下，爲何至今仍由國家財政部掌控，僅移轉部分業務由私人企業經營的策略，保持其國內石油產業壟斷地位之過程（1982～2006），探討其私有化過程中各相關行爲者所面對的策略結構與策略選擇性（贊成反對私有化）問題，藉以說明爲何國家經濟主義仍然主導墨國的石油產業政策。Heigl 先以特定的時空背景與制度結構下各主要行爲者的利益與策略取向的差異爲出發點，藉以突顯既定結構對於各行爲者在條件、資源機會與訊息上的不均等。影響墨國石油產業主要行爲者，在國際層次主要爲國際貨幣基金與美國（包括政府與多國籍石油公司）；國內層次則包含總統府、財政部、能源部、立法院各政黨、學術社群、*Pemex* 與民間中小型企業等。對於 *Pemex* 是否完全私有化，上述各行爲者基於各自的利益、資源分配與動員能力而有立場上的策略算計差異。Heigl 復以組織職能、學習職能、強制論述職能等三個觀察指標區分各主要行爲者的行動能力，再以這些主要行爲者與先前其他部門成敗經驗、其他中南美中國家國有企業私有化成敗經驗、政治－歷史「制度遺載」（institutional

臺大法律期刊資料庫

legacy）、部門財政狀況與學術理論等五個面向做爲論述參照點，進行逐次的分析，以突顯各行爲者在策略選擇上的條件強弱。結果顯示：贊成私有化的行爲者在各面向的職能與動員資源程度均顯著的高於反對私有化聲浪。然而，墨國財政部菁英官僚爲了鞏固國內石化集團權力與壟斷石油上游產業資源，捨棄其一貫的自由市場立場，協同議會反對勢力，訴諸公共媒體，主導並推動民間輿論的反對聲浪，否決了提高 *Pemex* 自主性的私有化營運政策及財政改革計畫，而以同意 *Pemex* 部分石化事業交由多國籍公司經營的策略應對壓力（Heigl, 2011: 89）。Heigl 以策略選擇取向探討 *Pemex* 私有化的過程，同時操作了各主要行爲者面臨的制度選擇性條件、職能與資訊流等限制，分析各行爲者論述與動員能力，論證事件（政策選擇）與策略計算下，結果通常是偶連與開放結局的。

據上，策略關係取向的應用不以特定意識形態爲導向，著重事件過程中結構與行爲者的策略結構與策略選擇性的交互論述、互動、關係與行動之改變，相當程度的傾向以語言論述與辯證作爲推論的方法，目的在闡述結構與行爲者間的策略與戰術選擇與調整過程；以及其共生與共變過程的生態關係轉變。相較於以新自由主義、理性選擇或歷史制度主義對於政策選擇的解釋，在深度與廣度上都有更合理性之論述基礎。

肆、結論

綜上陳述，「理念變因」轉向雖然橫跨了從後行爲到後結構的學術光譜，但仍可看出整個趨勢浪潮試圖超越微觀行爲主義與巨觀結構主義的理論後設，期望能超越前述政治科學研究中方法上的各種兩難困境，以便能對政治現象與發展取得更具解釋力的論證或理解。這樣的趨勢更突顯出政治科學界在客觀解釋 vs. 主觀詮釋路線選擇的掙扎。也就是說，「理念變因」趨勢著重在理論建構與實踐層次的操作上必需建立一個從微觀、中觀到巨觀的「全景式」模型，透過操作中層（巨觀與微觀之間）機制變項，推論驗證某個特定的行爲者「理念變因」確實會影響其決策選擇與行動，並以「論述」、「語辭」、「溝通」、「實踐」與「行動」如何影響其他行爲者作爲主要觀察變項；繼而探究不同層次間「理念變因」轉換的因果機制，與其

臺灣期刊資料庫

如何改變事件的結果與原本的結構。

因此，綜合本文中所討論的三個「理念變因」的理論原型與其擴展理論模型在操作上具有幾個共同重點：一爲在本體論上，他們大多爲將焦點置放在建構跨越分析層次的中程機制理論。強調特定時空條件下，行爲者兼具個殊性與鑲嵌性「社會本體」的特質。因此，「理念變因」的實證探討，就必須考慮其時空環境變因，明確化可觀察或操作的指標與跨層次推論與驗證之條件，釐清其所在層次與整體運作的機制與路徑。二爲在取樣時序上，各「理念變因」趨勢都提出了全景式理念型「復歸迴圈」模型。因此，不管是影響行爲者決策選擇變因、中介機制的運作或影響，都必須以較長時間的從不同空間環境進行觀察，取得跨層次「理念變因」的演變過程與證據，始能進行驗證與推論。這也是「理念變因」趨勢通常都是歷史的、建構的與過程（中程）的理論模型之主要原因。三爲在驗證上，「理念變因」不傾向依賴行爲統計學以個體爲基礎之各種聚合或離散數據進行線性推論爲唯一考驗指標。行爲者間非線性關係的發展，尤其是人際間的論述、語辭、溝通、互動等過程，與複雜網絡影響下的策略選擇與行動才是此波「理念變因」觀察的主要目標。然而，這也促使「理念變因」因果機制在追蹤與驗證的困難度與複雜度都相當具有挑戰性。四爲在方法上，跨科際領域的多元主義與折衷方法的包容性，促使「理念變因」趨勢除了比其他傳統方法更能融合量化與質性方法。基於模型運算的需求，開啓政治科學與電腦程式編程整合的新領域（Goertz & Mahoney, 2012）。

也就是說，整個「理念變因」趨勢較諸過去以詮釋爲主的方法，更能得以建構與測試「理念變因」運作模型，進行因果機制影響的驗證，對於人類行爲與決策獲得更爲精確的證據支持與理論的更新，甚至得以更準確的預測人類某些決策行爲。在實證上，「理念變因」趨勢的全景式模型各有其對應領域與指涉分析層次，應用的適合度則是可以依照研究主題與證據蒐整難易程度予以選擇（如表 1、表 2）。

然而，從本文前面的討論，「理念變因」趨勢在政治科學中的應用，也仍然有許多困難與缺點亟需克服。首先，就理論與模型建構完整度而言，本文前面所提及的各理論原型或延展理論雖均提供了全景式理論模型與復歸路線，宣稱可以兼具「建構邏輯」與「因果邏輯」。然而這樣的學術野心，

臺灣政治學期刊資料庫

在實證應用時，除了涉及龐雜的環境變項，因果推論也常以非線性的路徑進行。而受限於專書與期刊的篇幅、研究者的資源與時間等限制，通常並沒有辦法將整個模型涵蓋的路徑、變因進行一次性的全面操作。最常見的作法都是選擇其中一個階段的機制進行重要變項的操作驗證，其他過程則以「概念化」或「存而不論」的方式處理。這也是「理念變因」不得不強調中程因果機制重要性的主要因素。爲了克服這個操作與推論上的缺陷，「理念變因」各流派在進入實證應用時，常選擇模型中某一個特定階段（時序），以「變項簡化」的因果機制進行操作與驗證；再以壘加其他階段的因果機制結果驗證，逐步的完成整個模型的推論與驗證。如 Schimmelfennig 對影響歐盟與北約東擴決策選擇的「理念變因」類型，至少累積了十篇幅以上的研究，逐步疊加驗證在不同的階段，不同類型的「理念變因」確實會影響歐盟各國的認知、行動與決策選擇。O'Mahoney 亦是以系列作品論證個別國家如何使用「語辭綁架」、「語辭行動化」、動機歸因等機制，重新錨定國際法上適法性與道德性的認定標準，進而影響整個國際輿論與各國的政策論述與行動。而 Thornton et al. (2012) 與許多組織行爲學者更是以龐大的組織內部決策研究爲「整合巨觀與微觀跨層次制度模型」的各階段假設提供驗證。也就是說，「理念變因」趨勢之模型在操作上，必須仰賴許多個獨自單一步驟實證，分段的逐步逐次累積證據或測試，始能綜合或整合完成對某一個理論特定機制復歸迴線的驗證。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理念變因」趨勢各流派均強調影響行爲者初始條件（時空背景、資源稟賦與資訊流）的差異，較之單以理性選擇或主觀建構價值，增加了影響行爲者進行決策選擇時更爲務實的「理性參照」範圍。同時，各中程機制多以論述、語辭、語言、實踐、互動與溝通等表徵證據，作爲不同行爲者間相互影響（互爲主體）的驗證。較之傳統唯心主義對於「理念變因」的主觀辯證論述更增添了實證的色彩。尤其，在互聯網科際興盛之後的人際互動，政治或社會菁英如何以「語辭」、「語言」等機制運作「政策論述」，進行各種非傳統社會動員，以獲得支持與權力，進而改變社會結構，將會是未來政治學的重大課題。然而，「理念變因」趨勢各流派仍然無法區隔結構、物質等條件對於行爲者的影響，而單就行爲者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決策選擇的「唯心」變項進行單純主要效果考驗。[13]

第三、在證據的採集與驗證上，上述「理念變因」模型在實證應用時，除了涉及龐雜的環境變項，因果推論也常以非線性的路徑進行，通常難以進行全面性的嚴謹操作。然而，不管是進行「理論建構」或「理論驗證」，在立論、舉證與推論上仍無法避免 Beach (2016) 所提醒是建立於以既存理論爲基礎的主觀式「挑選櫻桃」進行假設之風險，並陷入蜻蜓點水式呈現選擇性證據之缺陷。而縱使最後各個機制假設獲得支持，其他「未知」、「未驗證」或「尚無法驗證」之機制對於行爲者策略選擇的影響，仍是政治科學界很艱困的挑戰。

最後，在應用技術與定義的操作上，「理念變因」各流派仍多以「軟性認知」方式概念化與操作各層次的「理念變因」，選擇實證個案也都以質性邏輯推演個案內比較研究爲主。近年來，Hedström & Swedberg 的因果機制分析模型、Beach & Pedersen 與 Bennett & Checkel 過程追蹤機制與 Thornton 等人整合巨觀與微觀跨層次制度邏輯模型已試圖增加「硬性認知」的方式，概念化與操作「理念變因」，建構中程的「半通則化」機制。其中，貝式機率相關概念與邏輯推論的應用對於命題與條件的假設建立，確實有助益於增加論證的客觀基礎與實證操作（Van Evera, 1997）；而電腦編程或模擬技術也進一步推昇了複雜因果機制可處理程度，並得以進行初步的模擬推估。運用科技技術的輔助，增進釐清行爲者與「理念變因」的分析層次，均有助於確認「理念變因」是在何種時空條件下，係透過何種機制對於環境與其他行爲者產生影響，對於未來的政策或決策分析也都具有相當的貢獻度。

從理想層次言，「理念變因」趨勢主要是由重視實證的質性方法學術界掀起的浪潮，質性詮釋與量化解釋對他們而言不再是對立或競爭的典範，而是可以兼容且互補的;而跨科際領域的對話更是拓展了「理念變因」趨勢的理論廣度與可驗證可能性。從實證層次言，研究者可以依研究主題，從「理念變因」各流派的模式中選擇一個適切的模型與階段，進行「理論建構」或「測試理論」的驗證。然而，在實務操作層面，人類的主觀詮釋仍然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3] Jacobs (2014) 曾提出「理念變因」單純主要效果的質性過程追蹤方法。

是其訊息處理篩選與因果解釋時的主要出發點，理論對話與方法折衷在操作上仍有許多鴻溝需要跨越。比如說統計、機率與編程要如何爲質性政治科學研究者駕輕就熟的運用；認知與社會心理學相關概念的借用與操作如何從「軟性認知」進化到「硬性認知」標準，更準確地推論行爲者的理念思維運作，而不失去人文社會與政治科學的特質與精神；其他如個體意識與決策選擇以及集體意識間如何進行交互轉換機制之建構、推論與驗證等，都仍留給政治科學界很大的努力空間。本文認爲「理念變因」趨勢的更張促使政治學界對於如何解決結構－行爲者議題的兩難困境，已邁進了重要的一小步，各種中程機制理論的開展、疊加與驗證應能爲政治行爲研究提供更深化理解與正向助益。然而，不管在理論與模型建構、研究方法、證據的採集與驗證與跨科際技術應用上，「理念變因」趨勢都尚有許多挑戰有待克服。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Sternberg, R. J. & K. Sternberg 著，李宏鎰譯，2017，《認知心理學》，臺北：雙葉書廊。譯自 *Cognitive Psychology*. Massachusetts: Wadsworth Publishing. Sternberg, Robert J. & Karin Sternberg. Lee, Hom-yi. trans. 2016. *Renzhi xinlixue Cognitive Psychology*. Taipei: Yeh yeh Book Gallery. Translated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Massachusetts: Wadsworth Publishing. 2016.

宋學文，2008，〈層次分析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及模型建構〉，《問題與研究》，47(4): 167-199。Soong, Hseik-wen. 2008. “Cengci fenxi dui guoji guanxi yanjiu de zhongyaoxing ji moxing jiangou” [Significance and Modeling of Levels-of-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Wenti Yu Yanjiu* 47(4): 167-199.

徐振國，2013，〈政治學改造運動的爭議和啓發：從「通則」到「脈絡」的轉向〉，《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5: 1-61。Hsu, Chen-kuo. 2013. “Zhengzhixue gaizao yundong de zhengyi heqifa: cong ‘tongze’ dao ‘mailuo’ de zhuanxiang” [Indications in the Perestroika in Political Science: Turning from Generalization to Contextualization].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45: 1-6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徐斯勤，2001，〈新制度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理論與應用之間對話的初步觀察〉，《政治學報》，32: 95-170。Hsu, Szue-chin Philip. 2001. “Xinzhidu zhuyi yu dangdai China zhengzhi yanjiu: li lunyuying yongzhijiandui huadechu buguan cha”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A Survey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5: 95-169.

陳婺郁，2014a，〈新制度論的困境與挑戰〉，《政治學報》，58: 1-36。Chen, René Ying-yu. 2014a. “Xinzhidulun de kunjing yu tiaozhan” [The Dilemma and Challenges on New Institutionalism].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 1-36.

陳婺郁，2014b，〈評析 Schmidt「論述制度論」與對政策制訂的啓示〉，《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0(4): 143-177。Chen, René Ying-yu. 2014b. “Pingxi Schmidt ‘lunshu zhidulun’ yu dui zhengce zhiding de qishi” [Analysis of Schmidt’s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Policy Making].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0(4): 1143-177.

劉正山，2008，〈代理人基模擬途徑的政治學方法論根基〉，《政治科學論叢》，36: 149-186。Liu, Frank C. S. 2008. “Dailiren jimoni tujing de zhengzhi xue fangfalun genji”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for Applying the Agent-Based Modeling to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149-186.

鄭力軒，2022，〈政策論述與日本少子化對策的演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4(2): 271-313。Cheng, Li-Hsuan. 2022. “Zhengce lunshu yu Japan shaozihua duice de yanhua” [Policy Discourses and the Evolution of Policies toward Low Fertility in Jap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111(6): 271-313.

鄭昭明，2006，《認知心理學：理論與實踐》，臺北：桂冠圖書。Cheng, Chao-ming. 2006. *Renzhi xinlixue: lilun yu shijian*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Taipei: Laureate book.

盧倩儀，2014，〈歐債危機之新自由主義根源〉，《政治學報》，58: 37-71。Lu, Chien-yi. 2014. “Ouzhai weiji zhi xinziyou zhuyi genyuan” [The Neoliberal Root Cause of European Debt Crisi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 37-7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西文部分

Abell, P. 2004. “Narrative Explanation: An Alternative to Variable-Centered Explan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1): 287-310.

Adler, E. & V. Pouliot, eds. 2011.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dler-Nissen, R. 2016. “Toward a Practice Turn in EU Studies: The Everyda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54(1): 87-103.

Bandura, A. 2006. “Toward a Psychology of Human Agenc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164-180.

Banta, B. 2013. “Analyzing Discourse as a Causal Mechan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2): 379-402.

Bathelt, H. & J. Glückler. 2014.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conomic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8(3): 340-363.

Beach, D. & R. B. Pedersen. 2019. *Process-Tracing Method- Foundation and Guidelines*. 2nd ed.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each, D. 2016. “It’s All About Mechanisms-what Process-Tracing Case Studies Should Be Tracing.” *New Political Economy* 21(5): 463-472.

Béland, D. & R. H. Cox, eds. 2011. *Idea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xford: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nett, A. & J. T. Checke, eds. 2015. *Process Tracing-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nett, A. 2013. “The Mother of All Isms: Causal Mechanisms and Structured Plur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 459-481.

Berman, S. 1998.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ment: Ideas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Interwar Europ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rman, S. 2001. “Ideas, Norms, and Culture in Poli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 33(2): 231-250.

Bevir, M. & R. A.W. Rhodes. 2010. The State as Cultural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yth, M. 1997. “‘Any More Bright Ideas?’ The Ideational Turn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omparative Politics* 29(2): 229-250.

Blyth, M. 2003. “Structures Do Not Come with an Instruction Sheet: Interest, Ideas, and Progress in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4): 695-70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Blyth, M. 2011. “Ideas, Uncertainty, and Evolution.” In *Idea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s. Daniel Béland & Robert Henry Co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3-101.

Checkel, J. 1998.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50(2): 324-348.

Checkel, J., ed. 2007.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ckel, J., J. Friedman, M. Matthijs, & R. Smith. 2016. “Roundtable on Ideational Turns in the Four Sub-disciplines of Political Science.” *Critical Review: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28(2): 171-202.

Coe, N. M. & D. C. Jordhus-Lier. 2010. “Constrained Agency? Re-Evaluating the Geographies of Labour.”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5(2): 211-233.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mmerij, L., R. Jolly, & T. Weiss. 2005. “Economic and Social Thinking at the U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6(2): 211-235.

Finlayson, A. & J. Martin. 2022. “Post-structuralism.” In *The State-Theories and Issues.* 2th ed., eds. Colin. Hay, Michael. Lister & David Marsh.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Macmillan, 166-188.

Finlayson, A. 2014. “Proving Pleasing and Persuading? Rhetoric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85(4): 428-436.

Finnemore, M. & K. Sikkink. 1998.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887-917.

Finnemore, M. & K. Sikkink. 2001. “Taking Stock: The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391-416.

Finnemore, M. 1996. “Norms,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Insights Form Sociology’s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0(2): 325-347.

Flache, A. & C. A. M. Fernandes. 2021.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Models.”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Analytic Sociology,* ed. Gianluca Manzo.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453-473.

George, A. L. & A. Bennett, eds. 2005.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Goertz, G. & J. Mahoney. 2012. *A Tale of Two Cultures-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fas, A. & C. Hay. 2011. "Varieties of Ideational Explanation." In *The Role of Ideas in Political Analysis: A Portrait of Contemporary Debates,* eds. Andreas Gofas & Colin Hay. London: Routledge, 13-55.

Gouin, R. & J.-B. Harguindéguy. 2012. "The Uses of Cognition in Policy Analysis: A First Apprais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2(1): 1-20.

Hansen, L. 2006.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London: Routledge.

Hay, C. & D. Richards. 2000. "The Tangled Webs of Westminister and Whitehall: The Discourse, 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Networking within The British Core Execu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78(1): 1-28.

Hay, C. 2002. *Political Analysi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Palgrave.

Hedström, P. & P. Bearman, eds. 2009.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dström, P. & P. Swedberg, eds. 1998. *Social Mechanisms: Ana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dström, P. & P. Ylikoski. 2010. "Causal Mechanis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49-67.

Hedström, P. & P. Ylikoski. 2014. "Analytical Sociology a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n *Analytical Sociology: Norm, Action and Networks*, ed. Gianluca Manzo.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Ltd.

Hedström, P. 2021.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Analytic Sociology*, ed. Gianluca Manzo.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490-505.

Heigl, M. C. 2011. "An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The Contested Privatization of the Mexican Oil Sector (1982-2006)." *Globalizations* 8(1): 81-96.

Hong, Y. Y. & L. A. M. Mallorie. 2004.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Lessons Learned from Personality Psycholog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8: 59-67.

Hong, Y. Y. 2009.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Moving from Describing Culture to Explaining Culture.*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Jacobs, A. 2014. "Process-Tracing the Effect of Ideas." In *Process Trac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 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 eds. Andrew Bennett & Jeffrey T. Check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1-7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Jarvis, B. F., M. Keuschnigg, & P. Hedström. 2022. “Analytical Sociology Amidst a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olution.” In *Handbook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Theory, Volume 1*: *Case Studie and Ethics*, eds. Uwe Engel, Anabel Quan-Haase, Sunny Xun Liu, & Lars Lyberg . London & Ner York: Routledge, 33-52.

Jessop, B.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 Cambridge: Polity.

Jessop, B. 2001. “Institutional Re (turns) and 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33(7): 1213-1235.

Jessop, B. 2005. “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New Formation* 56: 40-53.

Kamkhaji, J. C. & C. M. Radaelli. 2022.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Four Building Sites of the ‘Ideas School’.” *West European Politics* 45(4): 841-862.

Keuschnigg, M., N. Lovsjö, & P. Hedström. 2018. “Analytical Sociology and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1: 3-14.

Kreuzer, M. 2016. “Assessing Causal Inference Problems with Bayesian Process Trac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Endogeneity.” *New Political Economy* 21(5): 473-483.

Levi, M. 2009. “Reconsider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eds. Mark Irving Lichbach & Alan S. Zuck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7-133.

Lyall, J. 2015. “Process Tracing, Causal Inference, and Civil Society.” In P*rocess Tracing-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 eds. Andrew Bennett & Jeffrey T. Check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6-208.

Mahoney, J. & R. Snyder. 1999. “Rethinking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udy of Regime Chan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4(2): 3-32.

Mahoney, J. 2012. “The Logic of Process Tracing Tes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41(4): 570-597.

Mahoney, J. 2016. “Mechanism, Bayesianism, and the Process Tracing.” *New Political Economy* 21(5): 493-499.

Marsh, D. 2009. “Keeping Ideas in Their Place: In Praise of Thin Constructiv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4): 679-696.

Marsh, D. 2018. “Meta-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ory and Method in Political*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Science. 4th ed., eds. Vivien Loendes, David Marsh, & Gerry Stoker.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199-218.

McAnulla, S. 2006.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th ed., eds. Vivien Loendes, David Marsh,& Gerry Stoker.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71-291.

McNamara, K. R. 1998. *The Currency of Ideas: Monetar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etha, J. 2011. "The Varied Roles of Ideas in Politics: From 'Whether' to 'How.'" In *Idea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s. Danel Béland & Robert Henry Co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46.

Neumann, I. B. 2002. "Returning Practice to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Case of Diplomac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1(3): 627-651.

Neumann, I. B. 2008. "Discourse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luralist Guide*, eds. Audie Klotz & Deepa Prakas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61-77.

O'Mahoney, J. S. 2017. "Making the Real: Rhetorical Adduction and the Bangladesh Liberation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2): 317-348.

Ostrom, E. 2005.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astras, P. & B. Bramwell. 2013. "A Strategical-Relational Approach to Tourism Policy." *Annual of Tourism Research* 43: 390-414.

Pouliot, V. 2007. "'Sobjectivism': Toward a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1(2): 259-384.

Pouliot, V. 2020.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Meets Practice Theory: Renewing the Selection Proces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4(4): 742-772.

Powell, W. W. & P. J. Dimaggio, eds.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Quastel, N. 2016. "Ec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y: Towards a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8(3): 336-353.

Risse, T., S. Rope, & K. Sikkink, eds. 1999.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urugger, S. 2010.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icipatory Turn: The Emergence of a Norm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9(4): 471-49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Schimmelfennig, F. 2001.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1): 47-80.

Schimmelfennig, F. 2003. *The EU, NATO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Rules and Rhetor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immelfennig, F. 2005. “Strategic Cal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Menbership Incentives, Party Constellations, and Sustained Complia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4): 827-860.

Schimmelfennig, F. 2015. “Europeanization beyond Europe.” *Living Reviews in European Governance* 10(1): 1-34.

Schmidt, V. A. 2008.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303-326.

Schmidt, V. A. 2010.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 1-25.

Schmidt, V. A. 2012.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Scope, Dynamics, and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 In *The Argumentative Turn Revisited: Public Policy and Communicative Practice,* eds. Frank Fischer & Herbert Gottweis.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88-113.

Schmidt, V. A. 2022.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State*: *Theories and Issues.* 2th ed., eds. Colin. Hay, Michael. Lister, & David Marsh.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Macmillan, 108-129.

Scott, W. R. & J. W. Meyer. 1994.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s-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Individualis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Scott, W. R. 2008.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 3rd ed.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Sil, R. & P. J. Katzenstein. 2010.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Reconfiguring Problems and Mechanisms across Research Tradi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8(2): 411-431.

Sil, R. 2020. “Analytic Eclecticism-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75(3): 433-443.

Sperber, D. & L. Hirshfeld. 1999. “Culture, Cognition, and Evolution.” In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eds. Robert A. Wilson & Frank C. Keil. Cambridge: MIT Press, cxi-cxxxii.

Sum, N.-L. & B. Jessop. 2013. *Toward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Putting Cultural in Its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Thornton, P. H., W. Ocasio, & Lounsbury M. 2012.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rampusch, C. & Palier B., 2016. "Between X and Y: How Process Tracing Contributes to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Causality." *New Political Economy* 21(5): 437-454.

Van Evera, S. 1997.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endt, A.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3): 335-370.

Wendt, A.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ght, C. 2006.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likoski, P. 2014. "Agent-Based Simulation and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22(3): 318-336.

Zehfuss, M. 2002.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Levels of Analysis, Causal Mechanisms, and the Inferential Verification of Ideas*

*René Ying-yu Chen***

Abstract

Since 2000, there has been a movement toward bringing the micro-level variables of ideas and agency back into the disciplines of political science. Under these various ideational shifts, the agent-based ideas at the micro-level are conceptualized as terms of cognition or as 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es in social or cognitive psychology that are to be used to make inferences of structural or macro-level explanations on changes of policy-making or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This trend emphasizes that analyses of ideational factors should be unpacke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which can be operationalized and verified to have caus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studies of ideational variables should follow three lines of operationalization: the clarification of levels of analysis, the concretization of causal mechanisms,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practical inference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points mentioned above, this paper is split into three sections. First, it explores the various definitions of ideas and their denotations in various approaches. Second, it deconstructs the three major theoretical origins of ideas and their models following three lines of operationalization as mentioned above. They are: the structuration theory by Antony Giddens, the modified Coleman's Boat model from Hedström & Ylikoski's analytical sociology, and 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by Bob Jessop and Colin Hay, as well as their extended theories. The final section

* DOI:10.6166/TJPS.202406_(100).0002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E-mail: yychen@ncnu.edu.tw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synthesizes the practice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trend toward ideas. It argues the the ideational turn facilitat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tructure-agency dilemma with theoretical models, middle-range caus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verif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However, the valid inferences on various mechanisms at different levels need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nd evidence-based verifications.

Keywords: Methodology, Cognitive Science, Ideational Factors, Levels of Analysis, Causal Mechanism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